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4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桢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桢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	1
(1939年9月8日)	
同意抗大第一分校迁往山东·····	10
(1939年9月9日)	
在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	11
(1939年9月10日)	
共产党参政员捐款援助香港反汪工友·····	14
(1939年9月12日)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15
(1939年9月14日)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	31
(1939年9月16日)	
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36
(1939年9月18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42
(1939年9月24日)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61
(1939年9月25日)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62
(1939年9月28日)	

复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电	71
(1939年9月29日)	
在欢迎中外朋友晚会上的致辞	72
(1939年9月)	
为杨十三题写挽联	74
(1939年9月)	
在抗大四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75
(1939年9月)	
为韩忠良题词	76
(1939年9月)	
为八路军三五九旅题词	78
(1939年9月)	
研究沦陷区	79
(1939年10月1日)	
《共产党人》发刊词	83
(1939年10月4日)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	96
(1939年10月5日)	
给吕超的信	97
(1939年10月7日)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99
(1939年10月10日)	
复朱德、彭德怀等电	102
(1939年10月17日)	
为《共产党人》杂志题名	103
(1939年10月20日)	

为《冀中导报》题写报头·····	106
(1939年秋)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107
(1939年11月1日)	
复陈毅电·····	108
(1939年11月1日)	
给林中鹤的信·····	109
(1939年11月5日)	
给周扬的信·····	110
(1939年11月7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12
(1939年11月1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13
(1939年11月中旬)	
致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等电·····	114
(1939年11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15
(1939年11月下旬)	
为刘岷题词·····	116
(1939年11月)	
给马相伯家属的唁电·····	118
(1939年11月)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119
(1939年12月1日)	
为白求恩题写挽联·····	122
(1939年12月1日)	

为白求恩题写挽词·····	123
(1939年12月1日)	
致郭洪涛等电·····	124
(1939年12月4日)	
为《拂晓报》题词·····	125
(1939年12月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27
(1939年12月5日)	
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方针·····	128
(1939年12月6日)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	130
(1939年12月6日)	
致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电·····	132
(1939年12月9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	133
(1939年12月9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题词·····	134
(1939年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136
(1939年12月9日)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44
(1939年12月9日)	
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	146
(1939年12月9日)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	149
(1939年12月9日)	

复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等电·····	150
(1939年1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51
(1939年12月13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52
(1939年12月15日)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87
(1939年12月20日)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89
(1939年12月21日)	
纪念白求恩·····	192
(1939年12月21日)	
在欢迎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晚会上的讲话·····	198
(1939年12月22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199
(1939年12月23日)	
致彭德怀等电·····	200
(1939年12月23日)	
致朱德、彭德怀电·····	201
(1939年12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02
(1939年12月23日)	
致中共晋西北区委等电·····	203
(1939年12月23日)	
致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电·····	204
(1939年12月26日)	

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	205
(1939年12月27日)	
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	206
(1939年12月28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电·····	207
(1939年12月28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208
(1939年12月30日)	
晋西目前形势及我军事部署·····	209
(1939年12月31日)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	211
(1939年12月)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名、题词·····	213
(1939年12月)	
为悼念白求恩题词·····	216
(1939年12月)	
诗歌以押韵为宜·····	218
(1939年12月)	
为新华社业务刊物《通讯》题写刊头·····	219
(1939年12月)	
给吴玉章的信·····	220
(1939年12月)	
谈抗大农庄·····	222
(1939年)	
题延安新市场联·····	223
(1939年)	

谈爬山·····	224
(1939年)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一书题名·····	225
(1939年)	
为《中国青年》题名·····	227
(1939年)	
为延安《团结》杂志题词·····	228
(1939年)	
读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一书的批注···	230
(1939年)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247
(1940年1月1日)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名·····	249
(1940年1月1日)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词·····	250
(1940年1月1日)	
准备应付华中急变·····	252
(1940年1月5日)	
致聂荣臻、彭真电·····	253
(1940年1月5日)	
关于陇东问题谈判的条件给谢觉哉的信·····	254
(1940年1月8日)	
关于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的讲话·····	255
(1940年1月10日)	
致王世英电·····	256
(1940年1月10日)	

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	257
(1940年1月11日)	
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	258
(1940年1月11日)	
吴玉章寿辰祝词·····	260
(1940年1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262
(1940年1月16日)	
致王世英电·····	264
(1940年1月16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	265
(1940年1月16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266
(1940年1月1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67
(1940年1月18日)	
新民主主义论·····	268
(1940年1月)	
致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电·····	321
(1940年1月20日)	
给周扬的信·····	322
(1940年1月21日)	
给周扬的信·····	323
(1940年1月23日)	
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题词·····	324
(1940年1月23日)	

-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326
(1940年1月24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28
(1940年1月24日)
-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题词·····329
(1940年1月25日)
- 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朱德等电·····331
(1940年1月27日)
-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333
(1940年1月28日)
-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335
(1940年1月28日)
- 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338
(1940年1月29日)
- 在自卫原则下给进攻者以彻底打击·····339
(1940年1月30日)
- 关于扩军问题的指示·····341
(1940年1月30日)
- 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我之工作方针问题致朱德等电·····342
(1940年1月31日)
- 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344
(1940年1月)
- 为《中国文化》题词·····345
(1940年1月)
-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347
(1940年2月1日)

-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354
(1940年2月1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359
(1940年2月1日)
- 复王世英电·····363
(1940年2月2日)
-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364
(1940年2月3日)
- 致叶挺、项英电·····366
(1940年2月3日)
- 给陈云的信·····367
(1940年2月3日)
- 坚决彻底消灭石友三部·····368
(1940年2月3日)
-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369
(1940年2月5日)
- 为《中国工人》出版题词·····371
(1940年2月7日)
- 为《中国工人》题写刊名·····373
(1940年2月7日)
- 《中国工人》发刊词·····374
(1940年2月7日)
-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376
(1940年2月7日)
- 为《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题词·····379
(1940年2月7日)

复南方局电·····	381
(1940年2月9日)	
挺进军战略任务·····	382
(1940年2月11日)	
彻底消灭顽固派，极力争取有希望之人·····	384
(1939年2月11日)	
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指示·····	385
(1940年2月12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与口号致朱德、彭德怀电·····	387
(1940年2月14日)	
为应云卫题词·····	388
(1940年2月15日)	
为吴茵题词·····	389
(1940年2月15日)	
为《中国文化》题名·····	390
(1940年2月15日)	
致高双成电·····	392
(1940年2月16日)	
在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393
(1940年2月19日)	
致程潜电·····	394
(1940年2月19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	395
(1940年2月20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399
(1940年2月20日)	

反磨擦斗争的形势·····	408
(1940年2月20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409
(1940年2月21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	410
(1940年2月23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411
(1940年2月24日)	
对新军工作问题的指示·····	412
(1940年2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13
(1940年2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14
(1940年2月)	
帮助萧克挺进军巩固平西根据地·····	416
(1940年3月3日)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418
(1940年3月4日)	
致八路军、北方局等电·····	420
(1940年3月5日)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421
(1940年3月5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	424
(1940年3月5日)	
致王震电·····	425
(1940年3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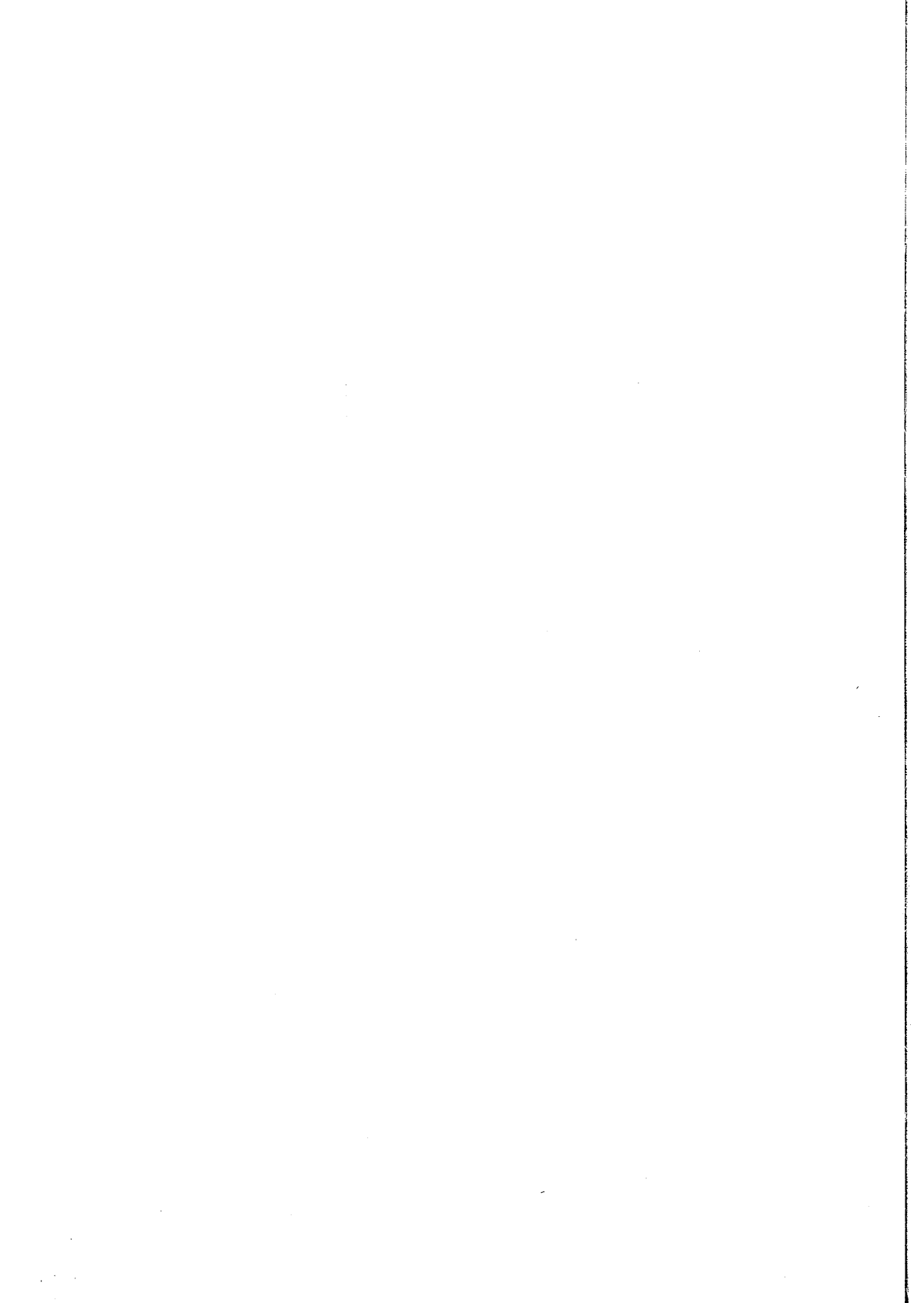
致项英等电·····	426
(1940年3月5日)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427
(1940年3月6日)	
对上海工作的指示·····	430
(1940年3月6日)	
给蔡元培家属的唁电·····	431
(1940年3月7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	432
(1940年3月7日)	
致聂荣臻等电·····	433
(1940年3月8日)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	434
(1940年3月9日)	
给王枚的信·····	435
(1940年3月10日)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436
(1940年3月11日)	
致琼崖部队领导人电·····	445
(1940年3月11日)	
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	446
(1940年3月14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447
(1940年3月14日)	
广泛印发讨汪救国通电·····	448
(1940年3月15日)	

考虑作必要让步，避免破裂两党团结·····	450
(1940年3月15日)	
坚决阻止李文军渡河·····	451
(1940年3月15日)	
致卫立煌电·····	452
(1940年3月15日)	
给全国各台电的指示·····	453
(1940年3月15日)	
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454
(1940年3月16日)	
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456
(1940年3月16日)	
复朱德等电·····	457
(1940年3月19日)	
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	458
(1940年3月19日)	
巩固中央与晋东南及晋察冀之联络·····	460
(1940年3月19日)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任务·····	461
(1940年3月19日)	
关于晋冀两省磨擦终止后团结友军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	462
(1940年3月20日)	
援助新四军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	463
(1940年3月2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468
(1939年3月21日)	

- 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469
(1940年3月21日)
-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470
(1940年3月23日)
-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471
(1940年3月25日)
- 为《边区群众报》题名·····472
(1940年3月25日)
- 目前华中的军事策略·····474
(1940年3月29日)
-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题词·····476
(1940年3月)
- 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477
(1940年3月)
- 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讲话的批语·····479
(1940年3月)
-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480
(1940年4月1日)
- 给萧劲光的信·····483
(1940年4月1日)
-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484
(1940年4月1日)
- 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485
(1940年4月1日)
- 致彭德怀电·····486
(1940年4月2日)

新四军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	487
(1940年4月3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	488
(1940年4月3日)	
致彭德怀电·····	489
(1940年4月4日)	
为儿童节题词·····	490
(1940年4月4日)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492
(1940年4月5日)	
致贺龙等电·····	495
(1940年4月6日)	
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重新题写校名和校训·····	496
(1940年4月10日)	
致彭德怀电·····	498
(1940年4月11日)	
复朱德、彭德怀电·····	499
(1940年4月12日)	
致朱德电·····	500
(1940年4月12日)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501
(1940年4月12日)	
致彭德怀电·····	503
(1940年4月13日)	
给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贺电·····	504
(1940年4月15日)	

关于对付韩德勤部问题致刘少奇等电·····	505
(1940年4月15日)	
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大众文艺》题名·····	506
(1940年4月15日)	
致贺龙等电·····	507
(1940年4月16日)	
致项英电·····	508
(1940年4月18日)	
致刘少奇等电·····	509
(1940年4月21日)	
复贺龙、关向应电·····	510
(1940年4月21日)	
致彭德怀电·····	511
(1940年4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512
(1940年4月29日)	



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 和目前时局的意见

(1939年9月8日)

国民参政会成立于抗战周年纪念之日，迄今已逾一年。

当我们接受聘请而加入参政会时，曾经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声明。我们指出“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

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经集会三次，总观国民参政会既往之工作，其最大之成就，就在于今日中国的最迫切的最中心的政治问题上——在坚持民族自卫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及打击各种中途妥协的倾向与罪恶活动上——能够真实地反映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第一次大会宣言中，曾经郑重地宣告：“本会兹特代表全体国民庄严宣

布：中国民族必以坚持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之日为止。”第二次大会又一致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并号召全国国民“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勿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第三次大会又决议“抗战既定国策必须坚持到底”，号召国民“坚其信心，齐其步伐，一心一德，彻始彻终，以复我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而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除此以外，三次大会对于抗战建国之各种具体问题，参政会同人曾有提案达三百余件，虽容或事有缓急之分，案有精疏之别，但莫不竭其思虑，以期有益于抗战建国。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付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热切希望。

我们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参政会的一年工作中，根据着去年七月五日我们声明之立场，遵循中共中央之“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诚挚的团结精神”的指示，在全国先进人士之指教和督励之下，与参政会同人共同地为着中国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我们确信：今日人民之最高愿望意志和要求，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以及巩固和扩大为达到和保障抗战胜利所必需的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因之，在过去三次参政会中，我们曾再三提出“拥护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幸获全体同人之赞助，通过专案。此外对于抗战有关之各项基本问题如建军，征兵，发展敌后游击战，实施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等，我们均以专案提供意见。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坚定地遵守着我们的立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

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而同时对于一切有害抗战及主和投降谬论，我们曾坚决地加以揭露和无情地加以抨击。在一二两次大会中，汪逆及其党羽李圣五等的卖国狂论，虽在隐秘的形式之中，就受到了我们及大多数参政员同人的打击和驳斥。一年以来，我们在国民参政会内之工作，虽自愧无多建树，但所敢自信者，乃是我们谨守着明确的团结抗战的原则立场，遵循着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而未尝稍有逾越。

现在政府已明令延长参政员之任期一年，我们愿就参政员地位将我们对目前时局之观感及今后抗战如何争取胜利之方针，向参政会同会人及全国人民申述之。

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是敌人经过两年的侵略战争之后，困难日益增长，我们抗战前途日益呈现出胜利的远景。但是另一方面，日寇非但没有改变其亡华灭华的方针，而且更加阴险，更加凶残，更加恶辣地实行它的一贯的灭亡我国的既定方针，更加狡诈地实行着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在军事上，正面停顿着大举进攻而集其全力扫荡敌后游击区战，借以一方面麻痹我们抗战的意志，另一方面巩固其在占领区域之根基；在政治上，则努力扶助和利用汪逆，大唱其反蒋反共降日之谬论，加紧进行制造伪党伪府伪军的活动，同时更唆使汪逆余党及其他心怀贰志之分子，在抗战营垒内来阴谋挑拨离间进行反蒋反共活动，企图造成迫使中国投降之局势；在经济上，则实行掠夺榨取倾销开发，以实现以战养战用中国之资源屠杀中国人民之毒计。同时，在抗战营垒之内，又确有一部分人对于时局作不正确之认识：或以为敌寇已和缓灭华政策，或

以为用某种国际会议方式即可解决中日问题，于是放弃自力更生之正确信念，不作准备反攻之实际工作，甚至有人居然忽视亡国危险，以为主要精力应用以对内，对反共及破坏国共团结阴谋，尽力策动，对一切进步力量，时加打击，对许多有为青年，横施压迫。煮豆兴燃萁之痛，阍墙当御侮之时。影响所及，不仅动摇举国同胞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而且降低国际舆论对中华民族之同情。而兵役困难，法币跌价等困难增加，尤使一部分人士发生抗战有心胜敌乏术之感。凡此种种，均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刻与严重。而目前国际形势之发展，对我国抗战环境发生极大之变化。由于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之签订，使防共轴心消散，使日寇在外交上更加孤立，在内政上引起震动，这一点当对我国抗战局面发生有利之影响。同时，因欧洲大战的爆发，使日寇将利用欧洲紧张局势以加紧进行全力灭亡中国的政策，使英国妥协派更加企图在牺牲中国的条件下求得英日等国妥协的可能，这一切对我国抗战局面将增加许多新的困难。因之，目前我国抗战的国内外环境，均是处在一个新的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新的国内外局面之下，全中国人民的当前严重任务，就是明确认清新的国内外情势之各种特点及其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同时，努力争取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每一有利于我的事变和因素，以增强我国的外援，以便克服一切危险，冲破一切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

为克服目前的困难与危险，为认真准备我国反攻的力量，我们认为目前应从下列各方面努力：

甲 在政治方面

一、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阵营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

二、加强战时政府，统一军政领导，容纳各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

三、实行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

四、认真惩撤贪官污吏，实行地方自治；

五、成立各地方劳资与佃主纠纷仲裁机关，使贫苦工农生活得到相当改善，以增加民众抗战热忱和便利兵役动员。

乙 在军事方面

一、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要做到变敌后为前线，积小胜成大胜。为此必须：

（一）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原则及当地特殊情况，规定和实行游击根据地的施政纲领；

（二）将游击根据地的军政权统一于该地区抗战勋劳卓著经验丰富之主力部队指挥之下；

（三）由中央政府经常给游击根据地抗战部队以必要的武装补充和必需的经济帮助；

（四）派有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决心与能力且具备坚强政治工作与良好纪律的部队到敌后去扩展游击战争；

（五）一切派往敌后之人员部队，均能以团结胜敌为重，均能忠

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去制造内部磨擦以害己助敌；

（六）派往敌后之人员部队，能实行民主政策，建立真正人民自己选举而由上级政府批准之抗战政权；同时实行改善民生政策，以团结广大人民借以摧毁伪政权，瓦解伪军，使我之人力物力不为敌用而为我用。

二、培养新的国防军——为的坚持抗战，特别是为的准备在有利形势下，真能实行反攻以驱逐敌寇出境，必须培养新的国防军，作为将来反攻的中坚。为此必须：

（一）从前线选拔有历史有战功的部队□□师，不分党派畛域，作为建军基础；

（二）规定国防师的统一的编制；

（三）国防师的干部应依照各该挑选部队的原有系统，给以近代化的军事训练与坚强的政治教育，同时并使之仍保存各该部队的优良传统；

（四）国防师的一切装备待遇和补给应一律平等，而较普通部队为高；

（五）国防师之训练，有一定的时期和一定计划，由有战功有能力之大员担任，分区实行，集团训练；

（六）建立国防工业，加紧对外购置，期于两年内完成□□个国防师的现代化装备。

丙 在经济方面

要破坏敌之建设和开发而实现我之生产和节约。为此必须：

一、破坏敌在占领区域之经济建设和物质开发，发动民众彻底

抵制仇货，禁止可资敌用的土产资敌，如某些特殊军需品，必须利用仇货者由国家统制购置；

二、由国家资助并奖励私人投资以扩大工农业合作运动，广泛地发展各种实用工业，尽力提高农业生产；

三、励行军政机关和私人节约运动。

丁 在财政方面

坚决改变以前的作风，彻底实行战时财政政策。为此必须：

一、法币的发行与资本的流通必须有适当的配合，使之避免法币在沿海与内地价格不平衡的现象；

二、严格彻底统制外汇并由国民参政会成立外汇委员会按期审查财政部对于外汇批准与使用是否适当，以杜绝一切舞弊营私；

三、严格检查和禁止私人操纵金融，捣乱法币，特别是居官者之营利图私投机操纵，犯者重惩；

四、在战区，尤其是沦陷区的省份允其发行一定额数的地方纸币和流通券；

五、国家的金公债，必须在海外侨胞国内银行界中广为劝募，并给以确实基金的保障，与国内投资的便利；

六、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依照各地的环境可能分别实行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之累进率，并渐改良田赋，豁免苛杂；

七、汉奸的财产必须严格实行没收，逃亡到敌区的地主，国家应代其征收较原来为少之钱粮，暂作国家的直接收入；

八、国家预算，由中央到地方均应重新规定，与抗战有关者应按需要增加，与抗战无关者，应尽量减少，可省者应削除；

九、国家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吏之待遇，应一律减低，并须低于同级军官的待遇，取消特费与兼薪，废除公家借款或购置中的回扣。

戊 在外交方面

要尽量孤立日寇和努力增强外援。为此必须：

一、认真联合一切援助和同情我国抗战之人民和政府，力求其对我增加物质上和精神上之援助；

二、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牺牲中国以与日寇妥协的阴谋，坚持外交独立自主之方针；

三、协助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及各界群众团体派遣各种代表团赴各国进行广大国民外交活动，以增强民主及和平力量对我之援助。

己 在党派合作方面

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实为实施上述各项办法，克服时局危险，战胜日寇汪逆的基本保证。为此必须：

一、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二、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严禁因所谓党籍及思想问题而妨害到工、农、军、学、商各界人民及青年之职业及人格之保障，以便造成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现象；

三、在抗战各种工作中，广泛地容纳各党派人材参加，不以党

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材。

当此寇深祸急、世界风云急剧演变之时，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全国进步，以便切实增加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作为人民代表和人民使者的国民参政员的我们，谨于四次大会之前，作此共同之声明，希望全国人民及参政员同人能给予指教鼓励督促和批评，同时作为同人等在会内外与全国同胞共同奋斗的方向。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九月八日

同意抗大第一分校迁往山东^[1]

(1939年9月9日)

朱、彭、杨：

同意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罗瑞卿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全体干部及部分学员在到达晋察冀军区后，选适当时机转往晋东南。

毛 王 滕
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关于抗大第一分校迁移一事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

在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 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9月10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很诚意地开这个晚会，来欢迎来延安的许多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全体同志，向国民政府林主席致敬，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致敬。

团结抗战已经两年了，这样的情形，是打破了两年前的情状。两年前，那时候是没有抗战没有团结的，现在是团结抗战了，这是新现象，是新气象。这个新气象已到第三个年头了，这是堪以欣慰的。可是，在两年的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有些小冲突小磨擦，因此，国共两党中间的同志，他们挂念、关切着，关于两党关系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这不仅两党中间的同志是这样，在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也是非常关切着，期待着完满的答复。其实这件事也并不是怎样难了解的，大家应该知道：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统一战线是一个大的团体，它包括有各党各派，各界各

[1]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于9月9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到招待处拜访慰劳团，并设宴招待他们。当天晚上，毛泽东陪同慰劳团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有1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军，一切的人——除了汉奸——都在内的。当然，在国共两党中间共产党是承认国民党是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大党。两党之外，虽然有其他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总是基础，如果国共两党不团结的话，这个统一战线是不能设想的了。所以我们说：国共两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抗战两年来，国共两党是以团结为中心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抗战二年后的问题了，但其基本方针是没有变化，也不应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团结”二字。团结是总方针。团结就要团结在进步基础之上。

现在两党中间，在部分的地方，有部分人员，发生一些磨擦，这种现象是不好的；但是，大家知道，在大局上，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在各界人士互相关心，互相督促之下，我们团结抗战是靠得住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论怎么样，除了团结，没有别的方针。……

因为，敌人要“反蒋”，我们全国人民，就要大家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敌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拥护国民政府；敌人和汉奸汪精卫等要破坏国共合作，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拥护国共合作；敌人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人要我们内部打仗，我们一定不打内战。我们要做亲者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是要处处与敌人对立，决不能有丝毫与敌人混同，一切与敌人混同的口号，都是媚敌降敌的幌子，一切与敌相同的言论，都是助敌张目的滥调，任何人要是想肩起敌人的口号而又言抗敌，那只是欺人之谈，残酷的历史将给以严厉的证明。

在今天，我们只有全国一致，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打胜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能出现。

今天我们欢迎革命前辈张溥泉先生，他是中国革命的老辈，又尽力于团结抗战的事业非常之大，今天要他老先生给我们以指教。同时欢迎各位慰劳的同志们，也要请他们指教。

共产党参政员捐款援助香港反汪工友^[1]

(1939年9月12日)

新华日报转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反汪罢工的工友们：

你们为进行反汪派汉奸斗争而宣布罢工离职，很明显的你们是给了全中国人民一个模范的好榜样，而且更说明了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先锋作用和坚决不屈的积极斗争精神。这一运动的继续开展与扩大，正是给予日寇和汉奸的最严重的一击。

我们特以最大的热诚向你们致诚恳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并每人捐资五十元（合计共三百五十元），交付新华日报代转，以表微忱。

此致

民族解放敬礼！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九月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就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工人为进行反对汪精卫派汉奸斗争宣布罢工离职一事，通过《新华日报》转赠捐款，并联名发表的慰问信。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

(1939年9月14日)

一 战争的新阶段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早已开始了，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它首先占领东三省，然后又于一九三七年大规模侵略中国^[2]。意大利帝国主义则于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亚^[3]。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联合侵略西班牙^[4]。一九

[1] 这是毛泽东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演的提纲。

[2]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门户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然后占领平津。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人民开始了英勇的八年抗战。

[3]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1936年5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1941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 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政府在“不干涉政策”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经过两年多苦战，1939年3月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三八年德国占领奥捷两国^[1]。在这一时期中，东方与西方，共有五万万以上人口卷入了战争，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却没有参加。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阶段。而现在开始，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则称之为第二阶段，因为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过去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他还没有世界规模，那末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

二 战争的原因

根据历史事实与列宁的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二十年工夫，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又爆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又来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战争。这个新的战争的开始阶段，他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上一次全世界经济危机之上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接着的不是繁荣而是特种的萧条。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赃过少的国家，如像日本与意大利，或者认为自己在上次战争中是损失了赃物的国家，如像德国，就全副武装跑上了战争的舞台，企图用战争来脱离经济危机，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爆发，并形成了他的第一阶段。

[1] 1938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同年10月，德国又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次年3月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德英法波等国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将直接间接地卷入战争，这是建立于新的经济危机之上的。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新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几年来是浸淫于英法美这些所谓“和平”国家之内的，并且正向德日意发展。在经济危机之上，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人民不满意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不论在早已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或现正借手于战争以实行法西斯化的国家，这种政治危机，这种人民不满，都日益尖锐化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又强大到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势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认为除了扩大战争，除了把片面性的战争扩大为全面性的战争，除了打坏他们的帝国主义朋友，不能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不能避免自己的死亡。

所有这一切，就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他临死前夜的打算。至于这种打算——用重分世界的战争来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避免自己死亡的打算，是一定要造成更大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一定要加速自己死亡的日子，他们就不能设想了。他们像疯狗一样，已经疯了，被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弄得完全疯了，他们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壁墙，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

三 战争的目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

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目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为了争夺对世界人民的统治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这种目的，过去阶段与现在阶段，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种目的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呢？还有什么善良的目的没有呢？一点也没有。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希特勒的“民族自决”，张伯伦^[1]的“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2]的“援助波兰”，其实都是“掠夺”二字。不过为了说得好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罢了。

四 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一切战争分为两类，照斯大林同志的说法，战争分为：（一）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二）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是属于第二类性质的战争。因为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丝毫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丝毫不利于其本国

[1] 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2] 达拉第，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1933年、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三度出任法国总理。1938年9月代表法国签署《慕尼黑协定》。

与他国的人民。这就是战争的掠夺性，非正义性与帝国主义性。现在战争的双方，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都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滑稽，一种欺骗。只有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这一次，许多人又弄糊涂了，他们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波兰则是民族自卫战争，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这种糊涂，是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的目的而来的，也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不同特点而来。

五 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于：（一）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说来，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举行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侵犯各弱小民族的利益，侵犯各民主国的利益，并在各民主国内部，策动法西斯威胁。于是全世界人民都有反对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侵略战争，并允许人民保存一点仅剩的民主。苏联则屡次提议愿意与各个所谓民主国家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如果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在当时出来干涉侵略者，如果在当时发生了干涉侵略者的战争，例如能与苏联一道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制止德意的侵略，援助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那末这种行动，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就有进步性。可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却并不出来干涉，他们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他们的目的，

在于使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双方都在战争中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来干涉，借收渔人之利。至于英法把奥捷两国奉送给德国，这是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说，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的。英法美想使苏德两国冲突起来，借刀杀人，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就好独霸世界。由于他们的这种“不干涉”政策，在战争中，就表现为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打仗，而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却“坐山观虎斗”，表现为战争的片面性，不普遍性，不干涉性。民主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的“不干涉”政策，没有能够被人民力量的逼迫而废除掉，因而出现了这种片面性，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第一个特点。（二）但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德意日帝国主义举行了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所谓民主国家却纵容这种战争这一种情况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还有民族解放战争，这就是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争，西班牙共和国的抗德意战争，与强大的中国抗日战争，而全世界人民与社会主义的苏联都真诚地援助了这种战争。这后一种战争，乃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存在——这就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两个特点。

六 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革命政策，毫无疑问的，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组织各民主国家内人民群众高涨着的反法西斯斗争，以保卫民主；同时还不放弃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之间制止侵略进一步发展的

斗争。在这最后的一点上，在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间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这一点上，就是在慕尼黑^[1]之后，由于西班牙失败与捷克灭亡所引起的在英法两国内部广大人民中甚至资产阶级左派分子中的愤怒情绪，还有逼迫张伯伦、达拉第政府放弃不干涉政策而与苏联缔结反侵略统一战线之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总之，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因此，在当时这个统一战线，有下列四个可能的组成部分：甲、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人民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是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丙、社会主义的苏联；丁、各个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这第四个组成部分，在当时之所以还有可能性，是因为这些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所谓民主政府，同他们本国人民之间，同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间，同苏联之间，在各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之下，在各国内部法西斯势力威胁之下，以及存在着的反苏危险之下，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这些成分中主要的力量是苏联，如果苏联同各个所谓民主国政府能够组成真正有效的统一战线，配合着各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制止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延缓大战爆发的日子的；如果发生战争，是能够战胜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而如果这样做，那是真正有利于世界人民，有益于侵略者以外的世界各国，而

[1] 慕尼黑，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

为国际无产阶级所赞助的。因此，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1]，缔结了苏法苏捷两个互助条约^[2]，最后还进行了英法苏三国的谈判^[3]，这种革命政策，是适合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是必要的，是正确的，是只能这样做而不能有其他做法的。

七 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

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面怕法西斯国家侵害他们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们怕苏联，怕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而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单独进行了掠夺的强盗战争。

英法苏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

[1]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20年1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60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布解散。

[2] 为了反对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威胁，苏联于1935年5月2日同法国订立了互助条约；5月16日，又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了互助条约。两个条约都规定：当签约两国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无端侵略的对象时，彼此应即给以支援和协助。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两个条约实际上均未被执行。

[3] 1939年春，以英法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就缔结反对法西斯国家的集体安全条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持续4个月之久，最终因英法缺乏诚意而失败。

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1]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2]就订立了。英法在与苏联谈判中的毫无诚意，毫无真正制止侵略的诚意，决心破裂三国谈判，不是证明别的，只是证明张伯伦已经决心作战了。所以大战的爆发，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而且是张伯伦要打的，因为如果真要避免战争，就一定要苏联参加才行。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3]，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懂得的。可是一些傻子却至今不懂得，还以为张伯伦的作战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不懂得张伯伦之所以参加三国谈判，仅仅是为着便于动员舆论，便于向民众说：我

[1] 波罗的海诸小国，指当时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1940年并入苏联，成为三个加盟共和国）及芬兰等国家。

[2]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德国同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它规定缔约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在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给第三方任何支持，以和平方法解决缔约国的一切争端等。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这个条约，发动了侵苏战争。

[3] 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1938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11月9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们英法政府是仁至义尽了，三国联合既不成功，就只好向德国开火了。

在这种情形下，九月初旬，德国与英法波三国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第二阶段。

八 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

在现时，在大战爆发之后，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了，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在现时，按照性质来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现在应从新的情况作新的划分，抛弃过去的那种划分法，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地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举行掠夺战争了。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而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现在是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成分之由动摇而最后转到敌人营垒，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两个营垒中的一个营垒，乃是一大变化。因而新的统一战线之可能的组织成分，就由

四个变为三个了。这种变化，第一，就使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由片面变为全面（由反动的片面变为反动的全面）；第二，就使新的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之组织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纯——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两个特点。

许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变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阶段，拿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事变，遗弃了新事变中所包藏的性质上的变化，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完全错误的境地，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境地。我希望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很快地改变过来，我也相信，只要一经提醒，就能改变过来。

九 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应该是怎样呢？

我以为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甲、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穿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管是战争的甲方或乙方，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个强盗魁首，唤醒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强盗的当，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

在各个交战国内，如果有共产党议员的地方，都要对于战争预算投反对票，如像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李

卜克内西^[1]同志在德国议会中所做的英勇坚决的斗争那样，而决不应该投票拥护战争，决不应该使自己的面目同社会民主党混同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内的社会民主党，正在踏袭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的覆辙，在所谓“保卫祖国”（资产阶级强盗集团的祖国）的口号之下，无耻地拥护战争。日本社会民主党，即所谓社会大众党，早已叛卖了无产阶级，拥护了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英法社会民主党，现在又正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叛卖英法无产阶级，拥护英法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波兰社会民主党则拥护被张伯伦收买的走狗——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叛卖波兰的民族利益。在波兰，毫无疑问，是应当动员全民并联合苏联抵抗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保卫波兰与解放波兰民族而战。但是波兰法西斯政府则压制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拒绝了苏联的援助，甘愿带领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把波兰变成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问题，我们同情波兰人民，但我们绝不同情波兰反动政府，波兰社会民主党拥护这样的政府，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不论在德日意，不论在英法波，凡属交战国内的共产党，只有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叛卖性，才能争取群众，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准备用革命战争打倒反革命战争。

乙、在各中立国内，如像在美国，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

[1] 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不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以一票的少数反对政府的战争预算。1916年因组织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游行示威，被判处苦役。释放后，积极领导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并从事建立德国共产党工作。1919年1月15日与卢森堡等一同被害。

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名义上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并图在战争中大发其洋财的那种政策。美国帝国主义在两年的中日战争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之下，已经发了一笔洋财，现在他又想在新的战争中大发其洋财。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谈话中，还以为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至于在国内放弃民主政治，与平时的经济生活，哪知它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宣布了所谓“局部紧急状态”^[1]，这样一来，它已经在步英法的后尘，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化与战争化了。共产党必须反对这种实际上援助帝国主义战争的假中立，反对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动，反对这些国家卷入战争，使战争区域不至无限制的扩大。

丙、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如在中国），或者反对宗主国（如在印度），用以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要反对这些国内的民族叛徒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才能发展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在各交战国的殖民地内，必须反对民族叛徒们拥护宗主国战争的叛卖行动，反对动员殖民地人民参加宗主国的战线，要把参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痛苦经验告诉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如果不反对民族叛徒，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希望的。

[1] 1939年9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欧洲战争形势的发展，宣布美国进入“局部紧急状态”（或称“国家有限紧急状态”），表示要在加强国家防御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采取增加海陆军员额，召集特别会议讨论取消军火出口禁令等措施。

十 战争的前途

这次战争是持久的战争。我很赞同伏罗希洛夫^[1]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说：“现代战争，将来一定是持久的，绵延不绝的，消耗战争。”他又说：“无疑的，在必不可避免的总的军事冲突中，要来一个破天荒的与你死我活的关头”。他的估计是很对的。这种持久性，是包括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包括反革命战争与革命战争，包括战争的继续与暂时的局部的停顿，包括参战阵线的改组变化，参战国家的灭亡与新建种种情况在内的，这样种种错综复杂曲折变化的情况，就组成了战争的持久性。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灾难，死亡、疾病、饥饿、失业、失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种悲惨现象将充满于全世界。在这种情形之下，毫无疑义的，将激起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压迫人民，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其规模将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要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除俄国外，各国都没有共产党。现在已经不同了，共产党已经在几十个国家内分布着，并且在政治上组织上强健起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不同了，苏联不但存在，而且成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坚决援助人民解放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将在这个战争中起其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强大作用。现在世界上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一切直

[1] 伏罗希洛夫，苏联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元帅。1934年至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接间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派，组成反动营垒，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大反动派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将来会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革命。如果以为他们会永远打下去，很容易地就被革命人民推翻，那是幼稚的见解。这是一方面——世界反动战线方面。另一方面，则有苏联，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这些，组成革命的战线，革命的营垒，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强大的斗争过程，艰难的持久作战的过程，教育人民，唤醒人民，组织人民，并领导人民向资产阶级战斗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地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是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进行了两年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是属于世界革命营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有力的组成部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定会在世界改造过程中起其强大的作用。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世界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但是苏联的存在与发展，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中国的好朋友，都是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援助者。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这是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

削弱，在这一点上说来，对于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对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苏联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这样说来，世界的黑暗是暂时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一定会死灭下去，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们的敌人也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1] 记者的谈话

(1939年9月16日)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泽东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

[1] 中央社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扫荡报》是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新民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报纸。

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1]，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2]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

[1]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经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

[2]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它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垮台，冯玉祥等北方实力派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1月13日应邀北上。在离开广州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这个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

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

(1939年9月18日)

同志们：

今天是开“九一八”纪念大会，九一八事变已经八周年了。“九一八”这一天，是我们一个痛苦的纪念日；“九一八”这一天，是亡东三省开始的一天；“九一八”这一天，是全国亡国危险开始的一天。关于这一点，从前我们这样讲过，但是有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以为九一八事变只会亡东三省，不会亡全中国的。他们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为的是它要同苏联开战，不是要同中国打仗，占领东三省是暂时的，等到他们两家打起来了，我们就没有事了，东三省可以很容易地收回来，或者说日本会送还给我们。这样想的人，直到现在还有。昨天苏联同日本订了一个停战协议，就是关于外蒙与伪满的边境冲突，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再打下去，向苏联屈服了，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和议。可是，有许多人他们就是不加自问，而怨天尤人地责怪苏联不该与日本成立和议，巴不得人家大打起来。这种观念是张伯伦的观念，是坐山观虎斗借收渔人之利的观念，是损人利己的观念。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九一八”大会上的讲话。

法就跟他们不同。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们就说：日本帝国主义亡东三省，是灭亡中国的第一步，第二步它就要灭亡我们全中国了。现在铁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证明了到底哪一种估计是正确的。

“九一八”到今天已有八年了，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国抗战也打了两年了，可是，现在中国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徘徊着：一条是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道路，这就是亡国的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这就是民族复兴的道路。只有走后一条道路，一切沦陷区才可以收复，东三省也可以收复，才能实现我们的口号：“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如果是走相反的道路，不坚持抗战、要投降，不坚持团结、要分裂，不坚持进步、要倒退，那要打到鸭绿江边是不可能的，一切失地是收复不了的，就连卢沟桥、山海关也是打不到的。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东三省要收复。现在，有一部分人不赞成收复东三省，他们只要收复山海关或者收复卢沟桥就够了，并且讲这个话的人，他们并不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去收复，而是希望依靠外国，希望九国公约签约国来开一个会议，逼迫日本归还我们被占领的土地，只要归还到卢沟桥就可以，卢沟桥以北就可以不还了。这个主张对不对呢？完全不对。我们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靠自己努力，决不是专靠人家。同志们！现在有些国家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去帮助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了，这样的国家现在已经表面化了的就是英国。英国同日本密谋搞“东方慕尼黑”，正在讨价还价，要瓜分中国。

现在，面对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发动的侵略，英、法两国已经向德国宣战，美国还在观望着。但是，在将来，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是会停止下来的，他们会联合起来，进攻苏联，进攻中国的民族革命，进攻全世界的人民解放运动，进攻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现在的世界已经起了大变化了，这半个月来世界形势已经大大地变化了。这就是全世界的反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已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对付世界革命了。虽然他们之间是有问题、有矛盾的，现在的欧洲大战就是德国同英、美、法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是他们哪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反动的。所以，他们之间虽然矛盾很多，但是在对付革命这一点上他们往往是能取得反革命的一致的。

我们要收复失地，收复东三省，东北的同志首先要团结起来。东北的同志不要分哪一个省、哪一个县的，不要分哪一个先干革命、哪一个后干革命，大家要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团体。东北的同志们，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其他党派的同志，都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在一切沦陷区里的人民，也是一样，大家不要闹意见，大敌当前，有亡国之危，还要闹什么意见冲突？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收复一切失地。东北的同志们，首先要同东北的老百姓很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东北三千万同胞的统一战线，再跟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全国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个口号是对症的三味药，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些人害了很危险的病，他们害了三种重病，叫做投降病、分裂病、倒退病。我们就给他们配了三味药：第一味，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味，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味，便是“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同志们赞成这三个口号，那很好。你们到全国各地

去，要向老百姓、向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讲这三个口号，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一直传下去，使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全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大家都了解和拥护这三个口号，大家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巩固的统一战线。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一切抗战的爱国分子，统统组织到这个巩固的统一战线中来，这是基本的力量。所以，没有统一战线，也就没有收复一切失地的希望；要收复一切失地，就一定要组成统一战线。

同志们！你们出去，都要去组织小统一战线。比方，你去当一个教师，就要把你的学生和学生的家属搞一个统一战线；你做一个连长，就搞他一连人的统一战线；你当一个新闻记者，就把你周围左右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在内搞一个统一战线。有多少人就搞多少人的统一战线，这种统统叫做小统一战线。这样的小统一战线愈多愈好，许许多多的小统一战线作为基础，组成大统一战线。小统一战线好比人身上的细胞一样，造房子的砖头一样，正像没有细胞就没有人，没有砖头就没有房子一样，没有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大统一战线，正是由这样无数的小统一战线，结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统一战线。我们这个大统一战线，还要参加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结成世界规模的最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是世界的大革命时代。全世界人口一共有二十万万，而反动派只有两三万万而已，剩下的十七八万万，便可以组成统一战线，同那两三万万人作斗争。两三万万人的反动派，他们手里有军队，有政权，有报纸，有政党，他们用来消灭我们的武器很多，而我们的武器就很少。然而，我们有一件东西可以战胜他们的，就是齐心协力。但现在我们心还不齐，因此要组织一个大统一战线，反对那些反动政府，反对他们进行的强盗战争。现在全世界的统一战

线是在组织过程中，全世界的老百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这次大战的爆发，更促进了全世界统一战线的加速组成。全世界的老百姓、弱小民族和苏联，这三种力量联合起来，同反革命作对，这就是全世界的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要收复一切失地，没有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的帮助是不行的，绝不能成功的。中国是世界的一环，绝不能脱离世界而生活。当然，我们不是绝对地依靠外国，依靠人家，而不要自力更生了，我们主要的还是依靠自己，还是要自己努力。我们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外国，而中国自己的伟大力量都看不到了。他们天天在读总理遗嘱，“必须唤起民众”，但是，他们并不唤起民众，相反地还在压迫民众。他们只在嘴上讲，而行动上就不执行。是不是全国人民起来了，统一战线组成了，外交就不需要了呢？那也并不是这样。当然，如果外交是联络帝国主义，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外交是有害于中国的，这就要不得。总之，在外交上凡是有害于中国的我们就反对，有利于中国的我们就赞成，这就是说，凡助我者则友之，凡助敌者则敌之。

在组织这个伟大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东北的同志们，你们已经努力八年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下去。要像大禹那样，他为了公益的事，“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你们现在已经是八年于外，没有回一次家了。同志们，你们还要准备在几年中也回不去，你们要准备敌寇不灭，誓不还乡！你们要有牺牲的精神，牺牲自己，为了公益。到底哪年哪月回家呢？现在还说不定。今年是一九三九年，我们要搞他一个持久战，一定要打下去，大家要下决心，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统一战线，东北的、所有沦陷区的、全中国的以至全世界的统一战线。同志

们，只要有决心这样搞，一定会有收获，东北一定可以收复，一定可以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那时候，我们的力量准备好了，就打回东北。斯大林同志已经准备了一个锤子，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头上打一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时候，我们可以开一个庆祝大会，不开纪念会了。那时候，我们中国得到解放，就开一个全国解放庆祝大会。现在，每个同志都要努力，大家努力学习和研究，努力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一日不胜利，我们一日不休息！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1939年9月24日)

一 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

斯诺：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似乎存在着一些差别。共产党一再着重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参看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但是，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上和言论中却没有什麼地位。国民党以为抗战的政治基础，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治集团对于国民党独裁的屈服。

我在重庆曾访问过张群^[1]将军，询问他对这一点的意见。他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久必被取消。蒋鼎文^[2]将军在西安告诉我同样的话。他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虽然从前的共产党员作为国民党军队一部时也可以负责官职或军职。去年陈立夫也说了实际上同样的一套。

[1] 张群（1889—1991），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2]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

蒋委员长自己最近告诉一位德国记者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

你对于这些言论有什么意见？统一战线的法律基础究竟在哪里？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究竟有没有？当着—个党否认另外一个党的存在时，能不能有一个两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历来很愿意学习希特勒。大家知道，希特勒曾经有一个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苏联只是一个名称，世界上实际没有这个国家。”可是，希特勒也有因为受了教育而发生某种觉悟的时候，就是当着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他忽然发现不但名义上有了苏联，而且实际上有了苏联了。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

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1]。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说到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屈服，也许某些人确实在那里这样想与这样讲，但我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既然吃了饭，睡了觉，而且口舌是他们固有的，又具有高等动物所特有的所谓脑筋，他们既然具备了这许多条件，因而也就有这种自由，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我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原则的，我决不去干涉他们这种自由，我也颇为忙碌，没有工夫去干涉他们。所谓屈服，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所有你说的那些，我相信大多数有良心有诚意的国民党员都不会那样说的，因为他们都是懂得抗战第一、团结第一的人。

至于蒋介石先生说了什么共产党不存在的话，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因为：第一，蒋先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但有政治常识，而且懂得更多的东西。第二，蒋先生是抗战领袖，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第三，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岂不是与他从前的话相矛盾吗？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过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所以，我相信，这种毫无常识的话，这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话，这种与蒋先生过去所说互相冲突的话，他应该是不会说的。而如果果然说了的话，那我们就有权利请他更正。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蒋先生

[1] 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2] 参见《论语·子张篇》。

如果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我们一定要请他更正。

说到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的确是有的。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执行蒋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对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给予合法地位。这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也还不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的明证。现在全国人民都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说到陕甘宁边区，这还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先生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面亲口承认了的。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了。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无怪乎全国人民要求行政机构的彻底改革了。要改变一下才好。

斯：中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说，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的一方面，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是属于诸民主大国之列。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什么是它的根据？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向民主方面有什么进步吗？民众获得任何政治力量吗？（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游击区的情形，指的是那些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

毛：根据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名称，你看，各国人不是叫我们中华民国吗？我想，这就是它唯一的根据。至于说实际根据，那是没有的。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原则，虽然已经讲了有几十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兑现，现在全国几万万人都要求兑现，大概有可能兑现的吧！到那时，那末就多了一个根据。我希望添上这个根据，因为这不但便利

于在外交上说话，而主要地还是便于抗战。

斯：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政府在性质上有任何变化吗？它是否仍然主要是国民党独裁的政府？

毛：在某些政策上有变化，它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这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变化。而其他政策上，如民主民生这一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现在全国热烈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至于政府的组织上，那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这一次，重庆开参政会，蒋先生在开幕词中讲，要集中各方人才，参政会通过了决议，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全中国人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

斯：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由于战争的缘故，而发生了什么变化？

毛：据我看，是部分地发生了变化。沿海沿江一带的大阔佬，大多做了汉奸或准汉奸，这就是汪精卫代表的那一群，这些阶层，政府已不能靠了。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能不放在中产阶级与广大的农民阶级之上，因为只有这些阶级，才是支持抗战的伟大力量。

斯：政府的阶级基础变化了，你说政府应该依靠于中产阶级及农民阶级身上，这是不是说，这两个阶级的代表现在已经在政府里增加了，而资本家的代表减少了？

毛：我是说应该放在这两个阶级上面，而并不是说已经放在这些阶级上面，我是说政府的前途，而不是说现状。

斯：是不是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有了变化？

毛：还没有。

斯：现在的政府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吗？

毛：是的。现在的政府，主要地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可是，这些阶级的代表，很多都已逃跑出去了。

斯：那末，现在还代表什么？

毛：在抗日政策上讲，主要地已放在中产阶级及广大的农民阶级基础之上，已代表了这些阶级，但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到现在还没有。

斯：因为共产党放弃了强调阶级矛盾冲突的宣传，取消了苏维埃，服从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采行了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停止在国民党区域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许多人在说，中国共产党人已不是社会革命者，而仅仅是改良主义者——目的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了。你对这种攻击如何答复？你是否还主张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在一定阶段上，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领导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毛：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斯：在反帝反封建的前面或后头，中国也有向法西斯独裁发展的可能吗？现在中国的法西斯组织的力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弱了？

毛：在中国，法西斯专政是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中国的一半，已经变成了殖民地，其他的一半也还没有脱离殖民地的危险，中国的经济，也还是半封建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是因为这些理由，使得中国那一些法西斯空想家失掉了前途。至于说过去中国政治组织中有某种组织也勉强地不适当地说它是法西斯力量的话，那末，这种力量，现在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国度内，要来闹所谓法西斯，是一定要碰破他自己的头的。



1939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

斯：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居于中国工人农民的主要领导地位的。除开对边区农民的领导，以及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共产党在实际上如何确定其对于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产业无产阶级现在是在日军占领区内）？

共产党如何教育工人农民使之认清现在革命的反日反封建目的？

毛：所谓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的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在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教育工农，是用共产党员的口，用文章，主要的还是用党的抗日的行动，使工农懂得要抗日要反对汉奸势力的目的。

斯：抗战是削弱还是加强了中国的封建因素？在今天，共产党的纲领中哪些是革命的反封建的纲领？边区以外任何地方，曾经认识到它吗？除非同时在全国范围实现革命的反封建的一面，抗战能够获胜吗？当农民甚至为了抵抗日本来组织自己都不可能——更不必提农村改革的要求——在战争当中能实现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吗？

毛：这里，首先要说的，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的首要问题是抵抗日本，反封建的任务要服从于第一位的目的——抗日。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改良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反封建的纲领。现在全国各地，不但工人农民，而且在小资产阶级，如广大的知识分子、学生青年、文化人，前进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人中间，酝酿着一个很大的民主运动，问题是由于受国家的旧的政治机构所束缚，因而没有发展生长，所以，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斯：中国有的资本家跑了，到汪精卫那儿去了，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再成为政府的主要部分了。这种情形之下，政府已失掉了依靠力量，为什么现在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代表了这些阶级，而没有提高工农的组织地位？

毛：这就是顽固性，阶级基础变了，而政府组织还没有变。因为这些人霸住在那里吃饭，而不让人家进去，所以要改变政府组织，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霎时的事情。

二 国际问题

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重庆有人担心接着会有一个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一阵苏联确实曾劝日本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你认为这在现在有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毛：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苏联和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苏联不会签订一个对这些运动不利的条约。

斯：我读了你对签订德苏条约一事的评论。你似乎认为苏联不大会卷入欧洲的战事……你是否认为，苏联只要不遭受进攻，即使纳粹德国看来接近胜利，苏联也仍会保持中立？

毛：苏联不会参加这个战争，因为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而这只是一场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在争夺力量优势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统治。双方都没有公理；苏联不会卷入这种战争，而会保持中立。

但是苏联并不是在所有战争中都采取中立政策。对于正义的解放战争，苏联不会保持中立。二十年来，这是苏联一贯的政策。例如，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苏联支持了中国革命。一九三六年到三八年，苏联支持了西班牙的共和军。从一九三七年至今，苏联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九月十七日苏军进驻波兰，也是为了解放白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

苏联会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会支持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的人民（社会革命）运动。苏联会支持革命战争，但在纯粹反革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至于现在这场欧洲战争的结果，苏联不会被战胜国，不论是英国或者德国，对它自己的威胁所吓倒。苏联一旦遭到进攻，它将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少数民族的支持。

今天反苏运动的中心已经不再是纳粹德国。它在于以英国为首的各民主国家。在张伯伦的领导下，各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组织广大的战线，企图把意大利和日本也拉进去。它们企图借此先打败德国，然后进攻苏联。国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斯：据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你看不出法西斯主义和英法等民主国家的事业有什么区别？

毛：从它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来看，没有什么区别。张伯伦正在组织世界战线，用以包围苏联、抗日的中国以及德国。他的目的是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推翻希特勒，孤立苏联，以便日后组织反苏的运动。张伯伦作为国际反动资本主义的领袖，懂得如果他 not 这样做，抗日战争就会胜利，德国就能收复它的殖民地，印度就会赢得独立，而张伯伦及其同僚的统治就会垮台。

斯：张伯伦先生的胃口恐怕没有那么大吧？难道你认为，张伯

伦在打德国的同时，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灭亡俄国？在我看来，张伯伦现在对付希特勒就够忙的了，还能准备对俄国打一场更大的仗？如果可能的话，他想争取俄国的友谊，以便打败希特勒，这样做对他来说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即使他确实有在将来搞斯大林的打算。你的意思是说，张伯伦过去曾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东引，还是说他现在积极地这样计划，还是说他希望通过现在这场战争搞成这样一条战线？

毛：他过去就想，现在正在计划，而且希望以后能实现这样一条战线。为什么？因为张伯伦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希特勒，还有印度造反的问题，和他本国人民中有人造反的问题，而苏联却支持殖民地的革命和资本主义宗主国里的人民（革命）运动。因此罗斯福也同情张伯伦。

斯：欧洲战场对日本在远东的战略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毛：日本会利用欧洲战争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加紧侵略中国，第二个目的是把它的侵略扩大到南洋。然而首先它必须征服中国，它现在主要的注意力就放在这点上。日本不会参加欧洲战争。由于避免参加，它可以继续同法、英、美做生意，而且也许还可以从它们那里借钱。日本要是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将难于征服中国。

德国现在正忙于自己在欧洲的事，不再能照顾日本。苏联同日本没有多少贸易关系，而且不会借一个铜板给日本。问题在于英、法、美会不会帮助日本灭亡中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欧战期间日本的第二个目的确是野心很大。但是不论英、法、美在欧洲是否被打败，日本总会把它的舰队集中在南方使用。那时

日本就可能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因为这个群岛是日英正面冲突的中间站，它是英国重要的势力范围，但却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很垂涎，因为那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如果英、法、美采取帮助日本的政策，使日本能打败中国，它们等于是武装起日本，让日本将来进攻它们自己。

日本希望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富强起来。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罗斯福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一个卫士——他的后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他的前卫。但是他对斯大林直摇头，说斯大林对他毫无用处。

斯：那么，你是否认为欧洲战争可能对中日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毛：如果英、法、美采取给日本以物质帮助的政策，则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然的话，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能够而且应该会在这个世界战争和混乱的时期中战胜日本。

斯：显然欧战一定会大大削弱英法在中国的地位。这可能既意味着削弱英法对日本的抵抗力，也削弱英法对中国的抵抗力。因此，就中国对列强的依赖关系来说，苏联援助的作用极大地增加了，特别是西北的供应线更加重要了。同样，苏联在西伯利亚和外蒙对日本的政策也更重要了。苏联的对华援助会不会增加到足以弥补英法援助的削弱呢？

毛：如果中国继续坚定地抗战，而且和苏联密切合作，苏联的援助不仅会弥补英法协助的减少，而且会远远超过后者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英法其实并没有“帮助”中国。它们至今采取的不过是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协助中国的政策。

斯：在这方面，苏联对中国解放运动的增强援助是否可能采取

一种有些类似你所说的苏联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解放运动的援助的形式？例如，在满洲有一个强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内蒙和新疆也有类似的解放运动。苏联是否可能派遣抗日的武装远征队来帮助这些解放运动？

毛：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打不打。

斯：苏联同纳粹德国达成协议，占领了波兰，这使苏联看起来好像和极权主义的轴心国进行合作来瓜分弱小国家。肯定许多人会这样认为。不论怎样，新的苏联政策意味着所谓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垮台。这一点将如何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口号？中国至今一直呼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给予支持，以反对极权主义的日本。中国过去的外交口号现在是否已经失效？

毛：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德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原话如此！）的政策。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利用战争来结束民主制度。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

德国和英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所谓民主国家的英国都是帝国主义强盗。它们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是强加在它们本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头上的。

现在英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张伯伦是世界的头号公敌。以前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作了很大努力想争取张伯伦，让他和苏联合作抵抗法西斯主义。但是以张伯伦为首的所谓民主国家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最后拒绝了这一建议，拒绝和苏联合作，结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扩大了。

张伯伦在英苏谈判中从来没有诚意。他决心不使谈判有什么结果。这样他就选择了战争而不是和平，因为显然如果把苏联排除在合作关系之外，和平就不可能有保证。这一点连资产阶级的重要发言人劳埃德·乔治也承认的。

同时，德国利用了张伯伦的政策，它声明放弃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政策放弃以后，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就失去了意义，不再是一种政治衡量的尺度了。努力争取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成立统一战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从新的情况出发，应该有一个区分各国的新的标准。我们该怎样划分国家的类别呢？

一类是进行或帮助进行非正义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国家，以及公开、积极支持这种战争的国家。另一类是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国家。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作相应的改变，因为迄今执行的政策已经不合适了。

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这个阶级已经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敌人。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的成分，（1）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3）苏联。

我在九月十四日的讲话中说过，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有两个特点：第一，片面战争已经变为全面战争。（这是指斯大林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说法，见三月份他对苏共中央全会的讲话。——斯诺注）其次，世界革命战线的组成已经从复杂变为简单了。现在，世界革命的口号已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革命战争击败反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支援人民革命战

争；支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战争。这些口号同样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法西斯国家以及利用战争作为实现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的所谓民主国家。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革命战线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阵线；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都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阵线；而且这种帮助是相互的。

在这个世界革命战线里，苏联帮助所有的参加者，而后者也支援苏联。这种支援是相互的。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对抗各国反动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里我插话问毛泽东，既然德国也是帝国主义，和英法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苏联竟向德国提供苏联的大量小麦、石油和其他战争物资，从而参与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顺便也问一下，苏联为什么继续向日本出租库页岛的油田，或者给日本以捕鱼权。后者价值很大，因为它使日本能输出大量的鱼，从而取得外国信贷，用以购买军火，进行针对“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毛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要看到政策的结果才能加以回答。苏联向日本出售石油的条件，他不清楚。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向德国或日本提供任何军火，而维持通常的贸易不等于参战。

我问，在现代战争中，向参战者提供坦克、飞机，跟为坦克、飞机本身提供燃料，这中间有什么大区别？为什么说美国卖给日本战争原料就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而苏联卖给德日同样的原料，却不是参加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战争和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呢？

毛笑了一下，承认说战争原料买卖和战争工具买卖之间的区别

不大。他说，关键是有关国家的政策是不是真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支持革命的解放战争。按这点判断，苏联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苏联积极支持过中国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战争，支持了西班牙革命战争，现在又支持中国的革命战争。苏联一贯站在正义的革命战争方面，而不会站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任何一方，虽然它可能维持同交战双方的通常贸易关系。

我说，既然这是一个“记录之外”的问题，我将不发表他的评论。他答称他不在乎；既然他自己的秘书已经全记下来了，对他来说已经“记录在案”。因此我在此包括了谈话的要点。——斯诺注

至于波兰问题，需要从几方面看问题：从德、英、法、波政府的观点；从波兰人民的观点；最后从苏联的观点。

德国对波兰进行的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其目的是掠夺波兰人民。波兰是英法的战略阵线，希特勒打击波兰就是摧毁英法战线的一翼。这个战争自然是我们所反对的。

对英法来说，波兰是它们金融资本掠夺的对象。英法鼓励波兰作为它们帝国主义战线的一部分，是为了利用波兰来抵制希特勒重新瓜分帝国主义赃物的企图。既然这是英法参加有关波兰的战争的客观条件，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立场，不应给予支持。

波兰本身有一个半法西斯的政府，为反动的波兰资产阶级所统治。它残酷剥削波兰人民中间的工农。它无情镇压波兰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同时，它的泛波兰政策压迫了波兰境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包括八百万白俄罗斯人、三百万乌克兰人和五十万日耳曼人。它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帝国主义政策。

波兰政府在英国金融资本的指使下，自愿地动员了人民做炮灰。它甘心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反动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并不

符合波兰人民的利益。

波兰政府二十年来一贯敌视苏联。在英苏会谈期间，它拒绝了苏联的援助。只经过两个星期，它就屈服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从而暴露了它的无能。一百五十万波兰军队不堪一击，把波兰人民让给纳粹分子去迫害。在马德里，装备很差的西班牙民兵还能守两年，波兰政府的军队却在两星期内就被消灭了！在中国，八路军守卫了晋察冀战区两年，顶住了日本，而波兰却没有五台山根据地，也没有八路军。所有这些弱点清楚说明波兰政府的邪恶与无能。我们不应为帝国主义波兰浪费我们的眼泪。

最后，说到苏联。纳粹入侵波兰使苏联面对这个问题：是让全体波兰人民沦于纳粹迫害之下，还是解放波兰东部的少数民族。苏联选择了第二种做法。

波兰东部大片领土上住着八百万白俄罗斯人和三百万乌克兰人。这片领土是作为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的代价，从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夺走，而落在反动的波兰政府统治之下的。今天，苏联不再软弱和年轻，只是把它自己的土地收回，加以解放而已。

来自前线的新闻报道描述了波兰少数民族欢迎红军的情况。人民把饮食送给红军战士，和他们拥抱，欢呼他们是救星。德军和法军占领的地方就没有这类新闻。这说明，苏联这次的战争是正义战争，有利于解放少数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斯：但是《读卖新闻》报道说，日军在东亚推广新秩序所到之处，也遇到类似的热烈欢迎。我敢说，德国报界也在告诉德国公众，波兰人热烈欢迎德国的炸弹。这些日子，被征服的人民不仅屈服，而且向征服者祝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毛：（大笑）谁也不相信《读卖新闻》的报道。虽然我没有见过德国人自称在波兰受到欢迎，我相信，要是他们这样自称，谁也不会信的。至于苏军受到欢迎的报道，有一些独立的观察家在现场，他们能亲自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最后，应该指出，苏联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张伯伦试图实现他的老政策。一方面，他封锁德国，在德国的西线施加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企图收买意大利和日本，并且安抚德国。他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送给希特勒，以换取废除苏德条约，企图借此把德国的枪口调向东方。

张伯伦主义的这些目的不仅现在有，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存在。苏联占领波兰是为了解放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收复苏联的领土，同时这也是巩固苏德条约、挫败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方法。最近的新闻表明，这个政策已取得很大的成功。

另一次，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苏联占领波兰主要是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还是出于政治需要。

毛泽东似乎认为，主要因素是战略上的需要，但是这个行动有军事目的也有政治目的。政治方面不是直接联系革命运动的世界条件，而是联系苏联同波兰东部的历史关系。另一方面，苏德条约不是政治的，而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斯大林要这个条约，为了阻止张伯伦建立反苏联盟的努力。毛声称，张伯伦已向希特勒清楚表明，他必须在打俄国和打英国之间作出抉择。如果希特勒打俄国，张伯伦准备容忍他占领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国。如果不然，他将用波兰反对希特勒。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被迫寻求自己同希特勒的协议。

我向毛指出，苏联的政策必然会引起自己辩证的反作用，很可

能会把希特勒加强到某种程度，以致对苏联构成真的威胁。苏联政策的短期效果将是大大削弱在英、法、美的共产党，特别是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赶走，并使工人阶级队伍本身陷入极大的混乱。如果共产党反对战争，它将遭到镇压，例如在法国已经遭到镇压。所有左翼外围团体如果积极反对战争，也会遭到取缔。这样一种发展将会增强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力量。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假借战争动员的需要，会迅速扩张。先锋力量的瘫痪会大大削弱反对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绥靖和做交易的势力，大大增加未来反苏联盟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设想，现在的苏德条约可能促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改变为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战争。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苏德条约为苏联保证了它防备德国人进攻而需要的安全。他说：“希特勒是装在斯大林的口袋里。”

那么，一切都会很好的——除非后来发现，斯大林的口袋里有一个洞。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 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9月25日)

今年四万人生产了三万担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不是小事。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1939年9月28日)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1]，竭力想同英国及一

[1] 苏法和苏捷两个互助条约都是在1935年5月订立的。

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1]。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

[1] 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1938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11月9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1]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

[1] 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兵侵入波兰，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17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苏联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的东侵，于9月17日进兵波兰东部。

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

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1]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2]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

[1] 自1939年5月开始，日“满”（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诺蒙坎地方，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在苏蒙军的自卫反击下，日“满”军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9月16日，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战；二、苏蒙和日“满”双方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以勘定“满”蒙发生冲突地带的界线。

[2] 张高峰，即张鼓峰。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失败求和。8月10日，苏日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发生冲突地带的双方界线的最后标定，由苏联代表2人、日“满”代表2人组织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

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

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得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1939年，毛泽东和苏联记者卡尔曼在一起。

复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电

(1939年9月29日)

陕西省政府蒋铭三先生：

敬电诵悉，陕北旱灾，中央拨款，关中输粟，仁声仁闻，万众腾欢。边区亦有旱灾，仅次绥榆一等，勉为升斗之助，略尽邻里之心，辱承言谢，愧不敢当，特电奉复，并颂勋绥。

弟 毛泽东
艳

在欢迎中外朋友晚会上的致辞

(1939年9月)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一个晚会，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很多朋友和来宾，首先是二年多来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何柱国将军。何柱国将军这次率领部队从大后方开赴前线，道经边区，我们开会热烈欢迎，——并同来的骑兵军的许多同志。

另外我们欢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参谋魏先生和蔡先生。八路军是在第二战区作战，是属于阎司令长官指挥的。我们欢迎第二战区的同志们到来。

我们还欢迎外国的来宾，这里有三部分朋友，一是大家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民国二十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晚会有印度医疗队的同志参加。印度是一个有三万万二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这次英国迫使印度参战，印度国民大众代表全体人民发表宣言反对打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印度国民大会的领袖就是不久前到过重庆的尼赫鲁先生。尼赫鲁先生派遣印度医疗队来华援助，中印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

今晚会上更欢迎苏联的朋友，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将使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最后胜利。

我们今天欢迎在抗战中劳苦功高的诸同志，是全中国的团结；欢迎国际的朋友，要一切帮助我们的各大民族，美国的人民，印度的被压迫民众和苏联团结起来。国内的团结，更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为杨十三题写挽联^[1]

(1939年9月)

国家在风雨飘摇^[2]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3]，于先生犹见典型。

[1] 1939年7月21日，原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部干部杨裕民，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不幸逝世。9月，八路军总部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这副挽联。杨裕民（1889—1939），原名彦伦，字灿如，又名裕民，排行十三。河北省迁安县人。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河北省工业学院任教授多年。结交爱国革命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策划冀东抗日工作。1938年被推为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7月21日因病逝世。

[2] 风雨飘摇，比喻国家动荡不安。

[3]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语出唐代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意思是说，燕赵一带古时候就以有许多慷慨激昂见义勇为的豪杰义士著称。

在抗大四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9年9月)

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为韩忠良题词

(1939年9月)

向光明大道前进，艰苦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

向光明前进
艰苦斗争胜利
是屬於我們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韩忠良的题词。

为八路军三五九旅题词^[1]

(1939年9月)

不但要勇敢，而且要明智，二者缺一不可。

[1]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所辖的一支劲旅，由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合编而成，于1937年8月下旬成立。1939年8月被调回陕甘宁边区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1939年9月，为了表示对三五九旅这支英雄部队的嘉奖和鼓励，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他们指明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研究沦陷区^[1]

(1939年10月1日)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

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磨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

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序言。

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

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间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一集。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则作为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二集。其余两个问题，亦将接续出书。

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

么“狭隘经验论”。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

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

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

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四) 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五)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

(六)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

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

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1]。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

[1] 毛泽东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基本上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

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

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

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羣衆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爲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

它的任務就是：幫助黨在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

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爲中共中央刊物《共產黨人》撰写的发刊词。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1]

(1939年10月5日)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以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此致

青训班二周年纪念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1] 安吴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为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要求，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陕西泾阳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

给吕超^[1]的信

(1939年10月7日)

汉群先生左右：

王右瑜^[2]先生到延安，接谈甚快。奉读大示，向往尤深。先生翊赞中枢，功高望重，下风引领，敢不拜嘉。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一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敬复。即颂
勋祉

弟 毛泽东上

十月七日

[1] 吕超（1890—1951），字汉群，四川宜宾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长。

[2] 王右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

泽东致吕超信手稿。内容为：“泽东同志：此物此土者，乃……”

毛泽东致吕超信的手稿。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

(1939年10月10日)

(一)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贩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达此目的，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

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复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9年10月17日)

一二〇师如何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两个月前我们谓该师师部将来准备移晋西北，系指国民党反共之时，现未到此时候，故不应来晋西北。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朱德、彭德怀并告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为《共产党人》杂志题名

(1939年10月20日)

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

毛泽东为《共产党人》题写的刊名。

No. 109

號 刊 創



發刊詞

中央政治局關於整黨案的決定 王稼祥

爲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和整黨而鬥爭 洛甫

共產黨員的權利與義務 劉少奇

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 陳雲

整黨案與整黨的黨案工作 李富春

關於新老幹部的問題 楊松

關於宣傳整黨工作及方式 楊松

關於反奸細鬥爭的錯誤認識 孔原

共產黨員被捕時的處理與氣節問題 楊松

研究黨的建設的認識和方法 楊松

專 論 擴大約中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委進行組織整黨的決定 楊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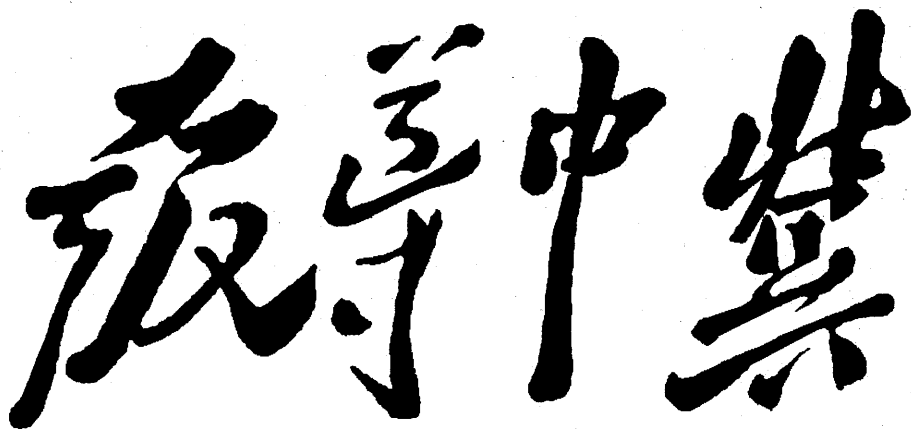
論 擴大約中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 楊松

1939年10月20日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

为《冀中导报》题写报头^[1]

(1939年秋)

冀中导报



毛泽东为《冀中导报》题写的报头。

[1] 《冀中导报》是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38年9月10日，在任邱县唐玉庄创刊。当时叫《导报》，1939年秋，更名为《冀中导报》。应周小舟之请，毛泽东为《冀中导报》题写了报头，并致信周小舟：“小舟兄：遵嘱写了，未知能用否。毛泽东”，但此时《冀中导报》已被迫停刊，直到1945年6月15日，《冀中导报》复刊时，采用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这个报头一直用到冀中区党委机关报《河北日报》创刊为止。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 决定性条件^[1]

(1939年11月1日)

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1]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的一部分。

复陈毅电^[1]

(1939年11月1日)

凡不积极反共之国党、国府、省府人员及地方绅士，均应采取协作政策，望通知部队及地方党实行。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陈毅来电提出的对盐务局、电报局及学校等的方针复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给林中鹤^[1]的信

(1939年11月5日)

若虚学长吾兄左右：

顷接八月一日大示，如见故人！前信未到，非敢慢也。寄奉百元，聊佐薪水，为数甚微，将意而已。尚祈努力奋斗，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不胜祷企。南天在望，延企为劳。肃此。敬颂
学安

弟 毛泽东上

十一月五日

[1] 林中鹤，字若虚，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给周扬^[1]的信

(1939年11月7日)

周扬同志：

文章^[2]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太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

[1] 周扬，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

[2] 指周扬撰写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该文发表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作文^[1]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1] 指毛泽东准备撰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1940年1月，毛泽东就此题目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篇演讲登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期、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1月14日)

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1月中旬)

目前时局可能好，可能坏，现在看好的可能更大，抗战两年后要投降是困难的。国民党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即所谓“反共好，反不了”。中产阶级活跃起来，现在敢于讲话。在目前时局下，我们的统战工作要有新姿态，提议对统战工作发一指示。要告诉全党克服投降是可能的，不要等待投降的到来。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最近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提议组织一个招生委员会，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宪政问题，我们要研究。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王明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等电^[1]

(1939年11月24日)

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

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就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省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一事，致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1月下旬)

华北党的工作，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我们党的政权的军队的工作基础。华北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是全党中最大的部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因大资产阶级已处于动摇麻痹状态中，联共又反共，联苏又反苏。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要组织中产阶级，组织工农民众，组织武装力量和政权，这是我们克服投降危险的内部条件。现在我们要大用知识分子，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扩编军队问题，如蒋介石承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我们应争取二十二万人的经费。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彭德怀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为刘岷^[1]题词

(1939年11月)

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岷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毛泽东

[1] 刘岷（1915—1991），河南兰考人，木刻家。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授木刻。当时他把到延安后创作的几十幅木刻作品手拓装订成册，分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
喜欢你木刻。刘岷用
十几年来画区村画刻久已
有了许多作品，希望
继续努力，为创造中
华民族的崭新艺术而
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刘岷的题词。

给马相伯家属的唁电^[1]

(1939年11月)

马相伯先生家属礼鉴：

马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联名为救国会领袖、教育家马相伯逝世，给其家属的唁电。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

(1939年12月1日)

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三、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问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为白求恩题写挽联^[1]

(1939年12月1日)

万里跋涉，树立国际和平，堪称共产党员模范；
一腔热血，壮我抗战阵垒，应作医界北斗泰山。

[1] 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安大略省人，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中国。1939年因抢救伤员感染中毒，医治无效，同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这是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时题写的挽联。

为白求恩题写挽词^[1]

(1939年12月1日)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
工作热忱。

[1] 这是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时题写的挽词。

致郭洪涛等电^[1]

(1939年12月4日)

郭、张、黎：

请你们向石友三、高树勋示意，河北地形较山东为差，高部以留山东与我们亲密合作为好，这于鲁于冀于他们本身均较有利。

毛 王

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的电报。

为《拂晓报》题词^[1]

(1939年12月5日)

坚持游击战争。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第四师前身）创办的《拂晓报》出刊百期纪念写的题词。

坚持斗争
毛泽东

毛泽东为《拂晓报》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5日)

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方针^[1]

(1939年12月6日)

朱、左、彭，陈、林，彭、罗，赵^[2]，并告刘、邓，聂，彭^[3]：

甲、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4]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晋西南新旧两军冲突又称晋西事变或十二月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一次严重事件。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12月8日至26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逮捕千余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给旧军以坚决还击，粉碎了他们的进攻。

[2] 陈、林，指陈士榘、林枫，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和政治委员。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和政治委员。赵，指赵林，当时任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4] 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

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其详情如下：

1. 日寇占领隰县、大宁、蒲县后忽自动退出。

2. 正于此时，旧军六十一军、十九军、七十三军突然联合，由午城、蒲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六区新军一九六旅部。旅部三日在永和城附近被解决。在其他区域，旧军亦在积极调动，准备消灭新军及进步政权与进步群众团体。

3. 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

乙、我们方针：

1. 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2. 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

3. 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

4. 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

5. 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军委 毛 王

十二月六日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1]

(1939年12月6日)

徐、朱、黎、江，并告陈、罗，黄，朱、彭，杨，左，傅、陆^[2]：

关于山东工作，除中央电示外，特提供下列意见：

(1) 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2) 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地正规化。用军队掩护、协同地方党，广泛地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钳制敌人。逐步补充主力，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以便应付较大战斗。

(3) 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临时食之于民的办法不能持久，而且影响部队的作战及正规化。胶东银行可发纸币，兑成其他的纸币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江华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黄，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朱、彭，指朱德、彭德怀。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左，指左权，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傅、陆，指傅钟、陆定一，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

供给鲁南及其他地区之用。在取得政权后发行流通券及收粮、收税，以便有解决军队给养的长远计划。

(4) 健全政治机关的工作，加强其与各支队的联系，明确军队的组织原则（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的又是中国人民的武装，不是统一战线的武装），一切最重要的干部，应当由党员充当。纠正军队中不正当的民主作风及地方党工作作风。

(5) 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而尤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

(6) 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地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

(7) 与一一五师靠近的部队，可与一一五师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一一五师对于拨二千五百人给山东纵队，应当郑重其事地组织。对所拨干部与战士，应当给以很好的教育与解说工作。

(8) 对于已编入八路军的过去佛教会的武装之工作，应加以研究。一般地说，应当同化它，把宗教的武装变成进步的武装，建立这些武装中的党的组织，但应慎重和有步骤，以免引起反叛。

毛 王 滕 谭

十二月六日

致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电^[1]

(1939年12月9日)

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9年12月9日)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致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电的主要内容。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题词^[1]

(1939年12月9日)

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1] 这是毛泽东为成立于1938年5月的延安世界语协会举办的展览会所写的题词。

我这是说一句话：为第六世界语
为形式，而载以莫正国际主义
主义之正莫正革命之正，那末
世界语是你们的，是你们的。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毛泽东给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的题词。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

(1939年12月9日)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来参加。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1]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

[1] 李昌，1914年生，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

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1]，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1]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5年8月1日发布的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

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1]，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2]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

[1] 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在义和团运动中于北京遭枪杀。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向德国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边立碑。1918年11月，北京人民将该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并迁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建国后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2] 光起，方言，瞪大的意思。

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

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1]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1] 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分别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蜀汉著名将领关羽的兵器、坐骑和战斗故事。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 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至二七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道理，

他们认识清楚，他们要进步，他们要民主，要参政；这民主和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现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叫做压迫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们不准倒退，他们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队伍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 补充指示^[1]

(1939年12月9日)

为补充我们六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A. 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1) 阎^[2]乘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 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睿、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的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 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 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 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 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的指示。

[2] 阎，即阎锡山。

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 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B. 我们方针：

(1) 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2) 各有关方面，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该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拢杨赵。

(3) 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 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 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 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 口号应该是：

(一) 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

(二) 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

(三) 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

(四) 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五) 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

(六) 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

(七) 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

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靖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8) 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9) 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1]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10) 为巩固晋西北阵地，一二〇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 王

十二月九日

[1] 陈，即陈士榘。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1]

(1939年12月9日)

贺、关、李：

晋西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毛 王

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的电报。

复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等电^[1]

(1939年12月12日)

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

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

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2]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给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电的主要内容。

[2] 雷任民（1909—2005），山西平遥人，当时任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续范亭，当时任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13日)

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介绍后讲话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

(1939年12月15日)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

[1]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1940年1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1]。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

[1]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2世纪初，东汉宦官蔡伦集中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造纸。此后，这种造纸法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

刻版印刷^[1]。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2]。火药的应用^[3]，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

[1] 中国的刻版印刷术，约创始于公元7世纪，即唐初年间。

[2] 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3] 中国火药的发明，大约在公元9世纪。到了宋朝初年，即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1世纪初，中国已经使用火药制造火炮、火箭等武器，供战争之用。

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

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1]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2]和黄巾，隋朝

[1] 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900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2]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8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18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的李密、窦建德^[1]，唐朝的王仙芝、黄巢^[2]，宋朝的宋江、方腊^[3]，元朝的朱元璋^[4]，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1] 公元7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2] 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874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

[3] 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4] 公元1351年，即元顺帝至正11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1352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1368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1]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

[1] 1840年至1842年，英国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1842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〇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2]，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战争^[3]。用战争打败

[1] 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1857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 and 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1857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2] 1882年至1883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1884年至1885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3] 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1901年9月7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

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部分版本)。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1]，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

[1]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

[2] 从19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在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1]。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

[1] 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1845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1927年1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1]“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

[1] 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 参见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

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

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

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

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

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

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

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出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

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小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內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

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時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 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

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

[1]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

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

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

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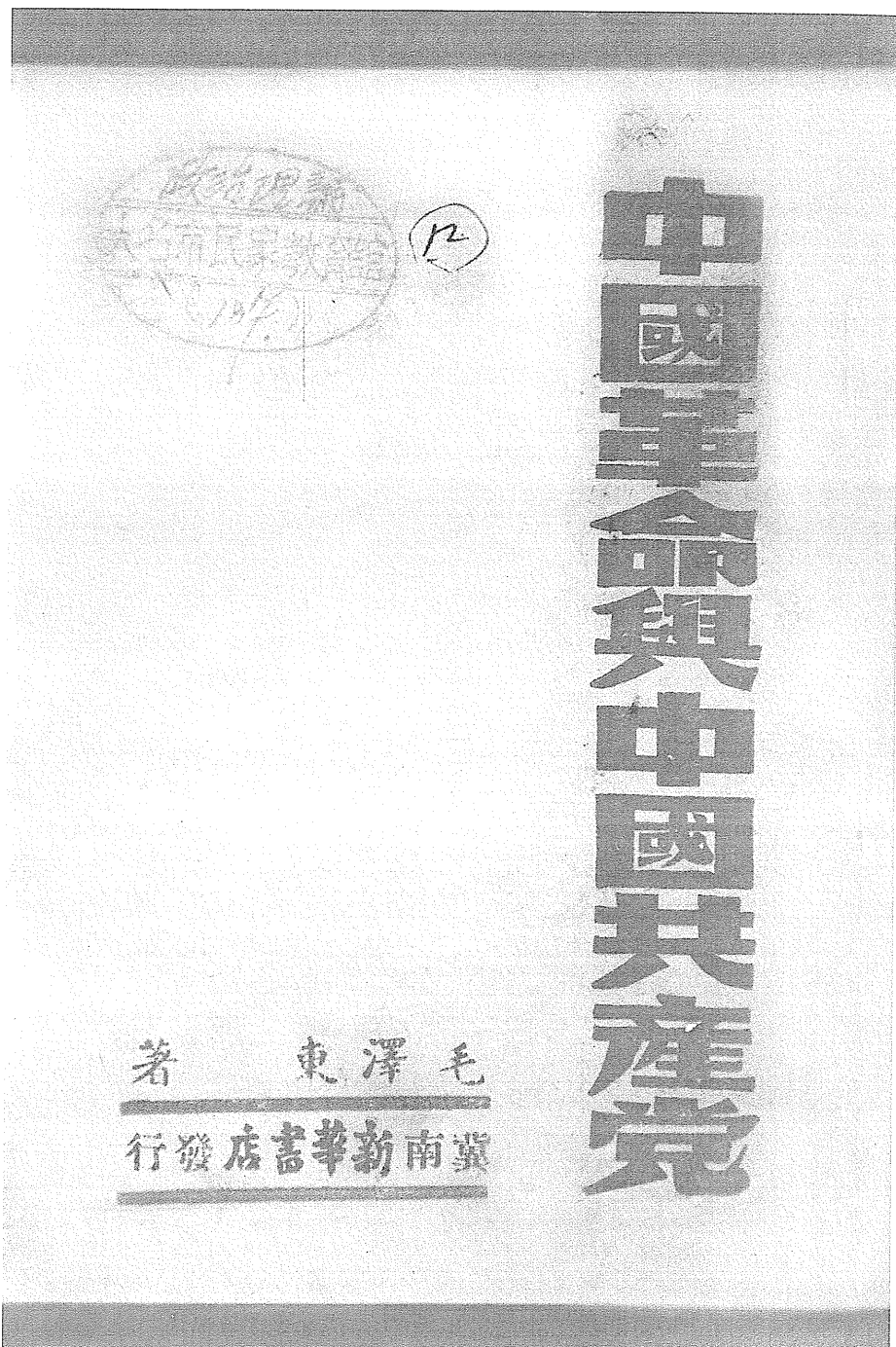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1949年6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1939年冀南新华书店发行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939年12月20日)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1]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

[1] 李林甫，公元8世纪人，唐玄宗时的一个宰相。《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在延安各界庆祝 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12月21日)

今天开大会，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而且这样的庆祝不仅在延安，而且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只要晓得他今天生日的人，只要懂得他为人的，只要是受压迫的，都会庆祝他。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哪些人是反对庆祝他、不喜欢庆祝他的呢？那就是自己不受压迫单单压迫他人的人，首先是帝国主义者。同志们，一个外国人，相隔万余里，大家庆祝他的生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回呢。

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

现在世界上分为两条斗争的阵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这是压迫人民的阵线；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反抗压迫的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阵线，有些人觉得好象是站在中间，但是它的对头，是帝国主义，它就不能不引社会主义为朋友，不能不属于反抗压迫者的革命阵营的一面。中国的顽固分子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一只手反共，一只手抗日，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们终究不成功的，如果不悔过，最后必要走向反革命方面去。革命与反革命的

两个阵线，都要有一个做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反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张伯伦。革命阵线中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上事就好办了。革命指挥官干些什么事？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而要这样，就要领导十几万万向压迫者作斗争，而使之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办的事。既然这样，那么，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要不要庆祝他呢？我想是要的，是应该的。我们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

我们要学习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一个是事业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斯大林同志有什么功劳呢？他发挥了这个道理，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事业方面，是把道理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他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

纸，天天说苏联不得了，社会主义是靠不住的，但是在今天怎样呢？把张伯伦的口都封住了，把中国那些顽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们也都承认苏联是胜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面帮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外，他还给了我们事业上即物质上的帮助。由于斯大林事业的胜利，他帮助我们很多的飞机、大炮、航空员，各战区里的军事顾问，还有借款。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世界上还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所领导的国家，这样帮助我们呢？除了苏联，除了无产阶级，除了共产党，除了斯大林，还有谁呢？

现在有些人，他们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但他们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帝国主义者都是口蜜腹剑的，张伯伦就是现在的李林甫，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驻军权、领导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哪一个帝国主义废除了呢？只有一个，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了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

我们庆祝斯大林同志的生日之后，还应该把这件事向全国宣传，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讲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纪念白求恩

(1939年12月21日)

白求恩^[1]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

[1]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 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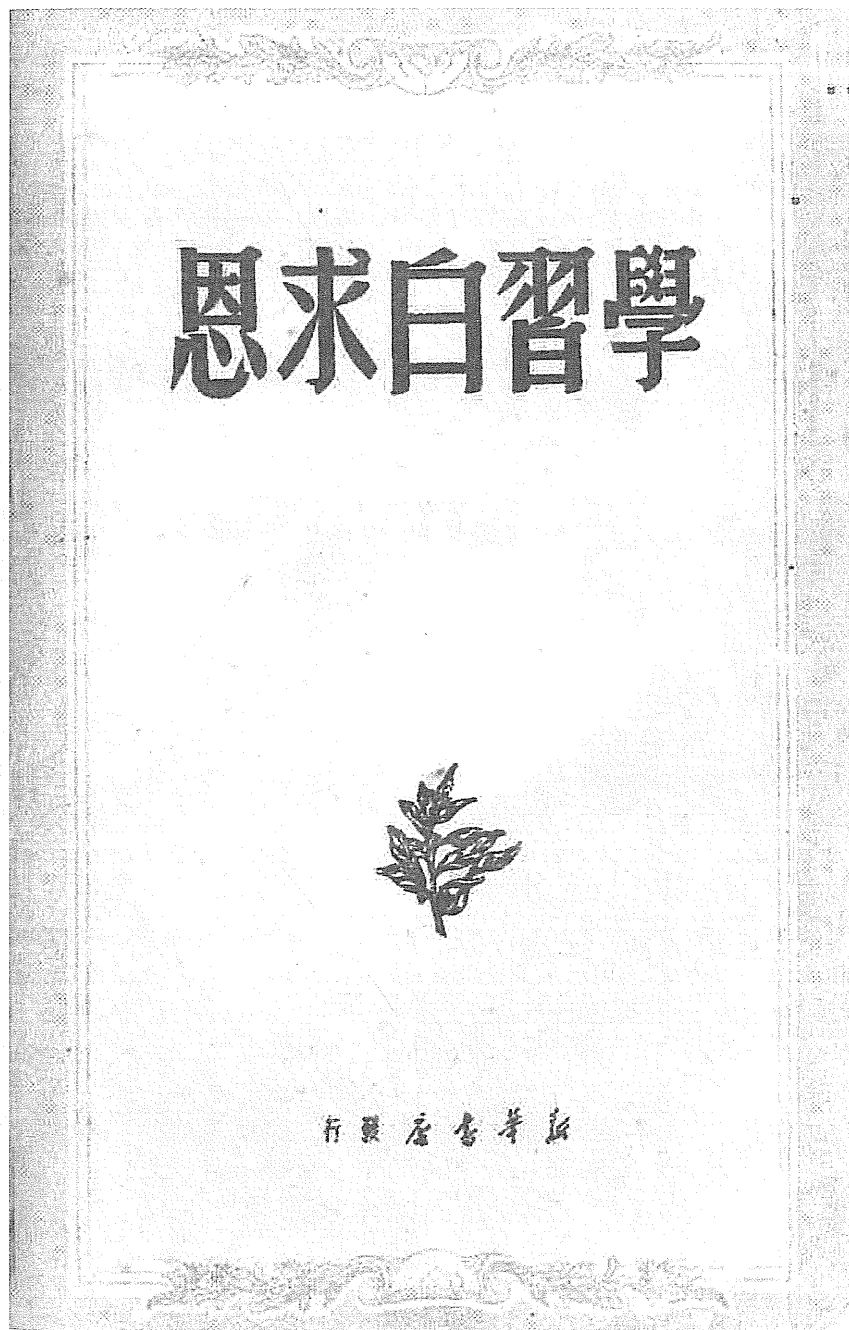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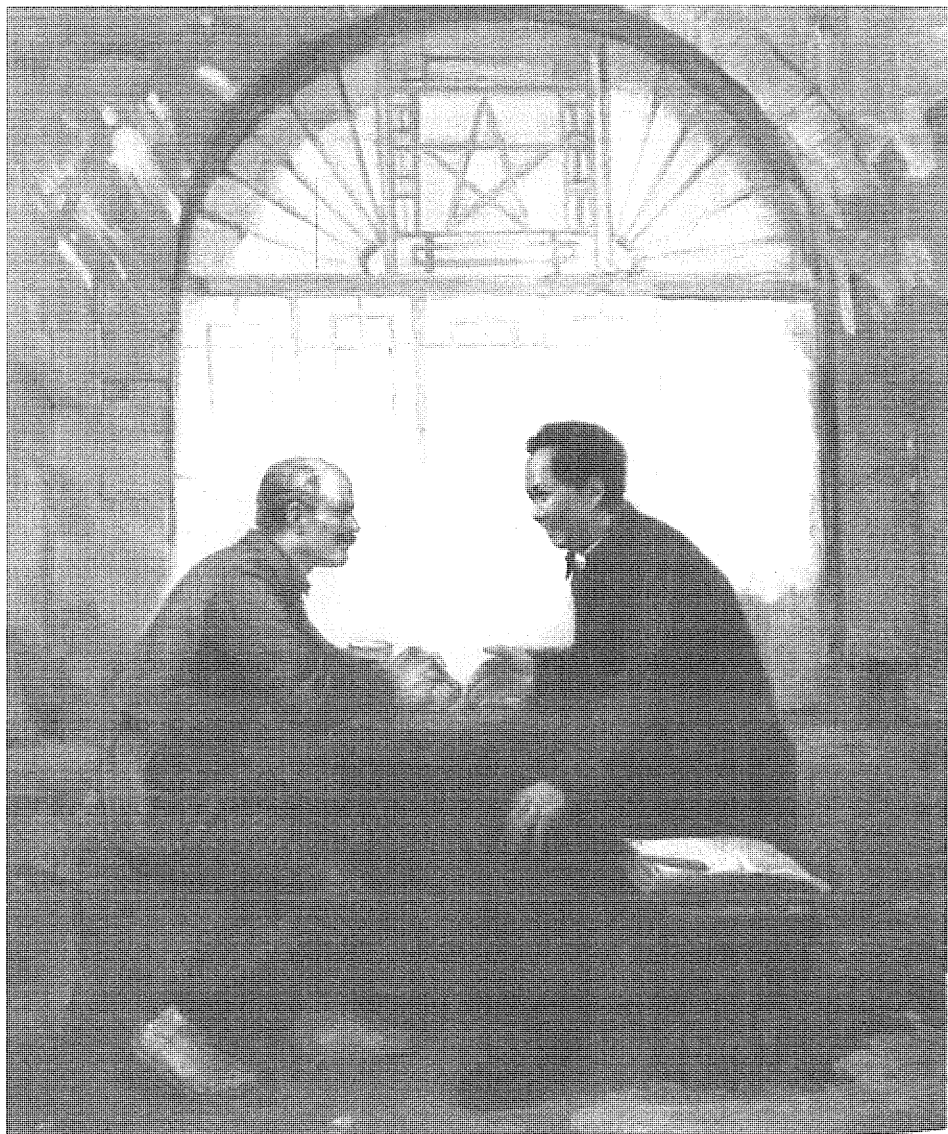
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会见白求恩》（油画）



1949年11月，新华书店发行的《学习白求恩》，该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纪念白求恩》。



《会见白求恩》(油画)

紀念白求恩

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二十
 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他到抗日戰
 爭最前線，在晉察冀邊區，他受黨
 的領導，不遠千里，來到中國。
 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
 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
 毫無私己的對犧牲的同志，人民的解
 救事業，他作他自己的
 事業，這是什麼精神。

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

我們大家要學習

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從這路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

利於人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

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

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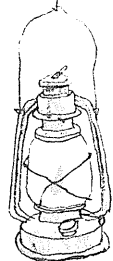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延安的國際主義救護士諾爾曼·白求

恩率領華北救護隊到延安，四月，初毛澤東

在鳳凰山麓龍洞內接見他並長談

談至午夜，楊尚昆書記

發給白求恩同志



《紀念白求恩》（中国画）

在欢迎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 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22日)

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我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到底。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八年之前红军与马将军则已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抗战到底的。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妥协，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我们真诚的欢迎那些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我们就欢迎到底。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的最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

[1] 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1939年冬离重庆返回防地。途经延安，毛泽东设宴欢迎。这是毛泽东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9年12月23日)

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晋西事变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9年12月23日)

晋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已调兵进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我应采取下述方针：当山西旧军一开战，新军应集中全力采取主动的运动战，首先消灭其一路，然后各个击破。新军反攻的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八路军必须坚决支持及帮助新军。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晋西南事件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彭德怀、彭绍辉、罗贵波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电^[1]

(1939年12月23日)

新四军甚危急。如第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不能马上前往增援，
请由该师在山东的部队中抽调一部兵力开过陇海铁路以南增援。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增援新四军问题致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23日)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反磨擦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中共晋西北区委等电^[1]

(1939年12月23日)

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2]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〇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晋西事变致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〇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电的主要内容。

[2]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致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电^[1]

(1939年12月26日)

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杨尚昆及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1]

(1939年12月27日)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关于李立三，他到苏联后，早已因他加入托派反动集团被苏联逮捕，不知他如何又能回来？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如果也有人相信，那其为人也拙劣得可以。“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二十三县，现在剩下了二十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千万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1] 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华报》记者发表的谈话的一部分。

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1]

(1939年12月28日)

朱、彭、贺、关、彭、罗：

据德怀同志电示，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毛 王

二十八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的电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电^[1]

(1939年12月28日)

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39年12月30日)

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立即来晋西北。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晋西目前形势及我军事部署^[1]

(1939年12月31日)

1. 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2]及决二纵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3]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

2. 目前整个形势，阎^[4]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5]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

3. 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为此：

甲、三五八旅及晋西北之新军，立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准备战斗。

乙、由一二〇师派出两个到三个团到晋西北，贺关^[6]立即出发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的电报。

[2] 陈支，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

[3] 指阎锡山在山西汾（阳）离（石）公路沿途建立的封锁线。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因指挥问题关系战斗胜负，望勿延迟。

丙、一二〇师在军区防地由聂^[1]从冀中调部队填防，原在军区周围所有阎之旧势力，均由聂即行计划扫光。

丁、陈支及所率之新军，须严防旧军袭击，彭罗^[2]须策应之。

戊、晋西南方面另由朱彭^[3]重部署。

毛 王

三十一日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和政治委员。

[3]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

(1939年12月)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毛泽东

現在吾場中習，吾生吾生，
將身身吾作就，吾生吾生，
止執是執失於作風，這不
能勝任以敵人的
毛澤東

毛泽东第二次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名、题词^[1]

(1939年12月)

边区实录初集

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1939年12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所写的书名和题词。

陕甘宁边区实录
初集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写的书名。

边区是人民民主的抗
日根据地，是实施
三民主义最彻底
的地方。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题词。

为悼念白求恩题词

(1939年12月)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救死扶伤，
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毛泽东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

诗歌以押韵为宜^[1]

(1939年12月)

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1] 1939年12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这是毛泽东复刘御信的主要内容。

为新华社业务刊物《通讯》题写刊头^[1]

(1939年12月)

通讯

[1] 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在《通讯》创刊之前,通讯科以新华社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请毛泽东题写刊头。毛泽东很快就用宣纸写了“通讯”两个大字一式三份供挑选使用。

给吴玉章^[1]的信

(1939年12月)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2]，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毛泽东 即

[1]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2] 指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1940年2月发表于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吴老：
写了一篇民治论，请
西，同时认为民治论，是
请为指正，指示为感！
毛泽东
印

毛泽东致吴玉章信的手稿。

谈抗大农庄

(1939年)

抗大农庄一个一百几十个人担任了六千个人全年四分之一的粮食，四百个人便可以生产六千人全年的粮食（还是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来耕种）。如果按照抗大农庄的办法，那末中国只要三千万人生产，就可以养活四万万五千万人。全国都这样做，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成什么问题？所以抗大农庄的路线是最好的；全国都应该学习抗大农庄的办法，人人要劳动，人人有衣穿，有饭吃，三民主义新中国就是这样！

题延安新市场联^[1]

(1939年)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1]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将其镶嵌于联语中，写了这副对联。延安新市场，1938年10月，延安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旧市场成为废墟。1939年在南郊建立新市场。

谈爬山

(1939年)

爬山是抗大课程表外的必修科目，在锻炼抗日的干部上，有着很大的意义。锻炼了每个青年的体力，锻炼出民族战士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是直接联系到战场的实践教育。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
一书题名

(1939年)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

抗日模范根据地
晋冀察边区

毛泽东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题写的书名。

为《中国青年》题名

(1939年)

中国青年

A large, bold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 '中国青年' (China Youth) in cursive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black and set against a light,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中' character is on the left, followed by '国', '青', and '年' from left to right. The strokes are thick and expressive, with some characters having long, sweeping tails.

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题写的刊名。

为延安《团结》杂志题词

(1939年)

团结战胜一切。

毛泽东

团结就是力量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团结》杂志的题词。

读河上肇^[1]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基础理论》一书的批注

(1939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上篇

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第一章 唯物论

二 为压迫阶级的哲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

但是，在另一方面，从来被压迫阶级对支配阶级实行抗争获得了新的势力，到了这个时代，观念论以及和观念论结了不解之缘的宗教，便会在某种程度以内，由利用它们作为精神羁轭的阶

[1] 河上肇(1879—1946)，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

政治的原因

级的手中，被颠仆下来。到了那时，破坏那种旧信仰的有用的精神的武器，当然是唯物论。所以从来当被压迫阶级将要获得新势力的“变革时代”，唯物论总是勃兴起来。——大凡从来的历史（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唯物论的消长，只有由这种见地才可以理解，决不是由唯物论本身可以理解的。那种把有名的哲学家们的大体的思想，从社会的根源分离起来，而只是编年的叙述了的哲学史，一般的对于唯物论和观念论的消长，所以不能说明它的必然性的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关于这事，在这里是无须作进一步的讨论的。[第9页]

四 十八世纪中法国的唯物论与无神论

（一）麦里亚^[1]

德波林曾就英国^[2]神论^[3]这样说过：“理神论的性质，那怕是过于微温，而且含有内在的矛盾，但对于主张人类的思考与科学的研究的自由一点，总算是有过大贡献。可是对于为了这种科

[1] 麦里亚（1664—1729），现译梅叶。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空想共产主义者。

[2]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理”字。

[3] 理神论即自然神论。英国自然神论的主要代表有多德威尔、考尔德、柯林斯等。

学世界观而行的斗争，而在自己著述中把持着并宣传着这种世界观的人们，却常常会惹起大的危险。这是我们不能不说明的。‘战斗的教会’不止是用言语去庇护有害的学说的，它还采用了现实的手段，这就是说，它们要拔去那些敢于批评宗教教理的人们的舌根，或者把他们投在薪材上，用火烧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无怪大多数自由思想家，都把他们真正的见解隐蔽起来了。” [第21页]

(二) 杜尔巴克^[1]

……

……现在，法国的布尔乔亚，已成为世界反动的支柱。唯物论与无神论旗帜下的革命传统，早经移到交^[2]普罗列达里亚了。正如，普罗列达里亚之旗帜的解放，有着阶级社会之完全的扬弃的意义一样，他们之精神的解放，和宗教的及观念论的偏见之完全的清算，是有着联络的。 [第33~34页]

……

[1] 杜尔巴克 (1723—1789)，现译霍尔巴赫。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2] 毛泽东将“到交”二字互换了位置。

一〇 相对的真理与绝对的真理

……

最近看到的鲁波尔的列宁与哲学一哲^[1]中，对于同一问题的说法，是下面这样。

……

……一切东西是相对的，因而相对性的本身也是相对的，所以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关系或区别，也只是相对的，决不是绝对的。结果，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能说到绝对。真正把相对性的见地彻底贯彻的时候，那就不可避免的引导到这种见地的否定……[第91~92页]

……

二 辩证法的思惟之本质

……

……总而言之，所谓辩证法的全面性的要求，不外就是对于现实的事物之真实性的要求。？
“真理（真实常是具体的）”^[2]这个命题，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1] 毛泽东将“哲”字改为“书”字。

[2] 原引文为：“真理（真实）常是具体的”，但“（真实）”二字右边的圆括号印刷模糊，毛泽东认为此句不通，将它改成：“真理（真理常是具体的）”……。

……所谓 in Detail (详细地,) 毕竟就是“全面的”的意义。固然我们只是抽出对象之某一方面, 或某一属性, 或某一特征, 我们也可以作出某种结论来。但是在实际上, 和这种结论正相对立的方面(有时这种事实很多)的存在, 也是能够有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靠着一方面的观察, 是极其危险的。由一方面的观察所生出的结论, 只不过表示真理的一方面而已。所以“探究须详细地占有材料,” 马克思这一句话, 毕竟不外就是用不同的语句, 拿来表示辩证法之全面的探究的要求。[第118页]

……

五 在发展过程上(在运动之流上)把握事物

(四) 由量到质的转化

……

……所谓单纯的分量上的变化, 含着具有同一的品质的事物之量的变化的意义, 但是由单纯的分量上的变化, 既然可以生出品质的差异, 这件事实, 毕竟不外是具有同一的品质的事物, 在某种条件之下, 复生出品质相异的方面这个意义而已。单纯的货币与资本, 是一种对立面, 但是生出剩余价值的货币, 就成为资本。单就这一点而论, 货币与资本, 又可说是同一

质变由矛盾变, 未说。

物了。[第199页]

(五) 否定之否定

……

反倾向斗争
……这种生产方法，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之分散为前提。正如它排斥这些生产手段之集积一样，在这种生产方法之下，对于协作，同一生产行程之内部分业和对于自然之社会的支配与制御，以及社会的生产力之自由的发展，也是被排斥的。它只有与生产及社会之狭隘的原生的限界，才是两立的。……[第201页]

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格论》里面所引证的麦粒的例子，曾为许多著作家所引用。我在这里，也把这个例子，引用在下面。

要说量变
“……无数的麦粒，是可拿来磨碎的，可以煮熟的，可以酿造的，可以消费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麦粒，如果找着了正常的诸条件，落在适当的土壤之上，在这个时候，它因为受了热度与湿气的影晌，便发生了一种特有的变化，它发芽。麦粒自身消灭，即是被否定了，从它发生出来的植物——麦粒之否定——便取而代之。然则这种植物的正常的生涯，是怎样的呢？这种植物成长，开花，结实，最后再生产很多的麦粒。这些麦粒，一旦到了成熟的时候，茎即枯死，茎自身又被否定。由这种否定之否定所生出的结果，我

们所再得到的最初的麦粒，但不是单一的麦粒，而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麦粒。谷物的种类，所发生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今日的麦粒和百年以前的麦粒，差不多是依然同一的。……”（《反杜林格论》，德文本，一三八页。）[第205~206页]

？

为什么？

还有一层，在许多事例中，由否定之否定所生的结果，每每和最初的事物生出显著的差异，这种事实，是应该依次一为论及的。例如在商品流通的发展过程中，单纯的商品，否定它自己便成为货币，而单纯的货币又否定它自己，便成为资本。在这个时候，资本原来不是复归到单纯的商品的东西。又例如在温度次第上升的状态之下，冰被否定变而为水，水更被否定^[1]为蒸气，在这个时候，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即蒸气，也是和最初化^[2]的出发点即冰，在品质上是极不相同的东西。要之，一切都必须就事实去学习。[第211页]

第三章 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

三 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之辩证法的关系

[1]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变”字。

[2] 毛泽东把“化”字圈掉了。

……“蜘蛛与织工从事类似的作业；蜜蜂在蜂窝的建筑上，会叫人类的许多建筑师觉得惭愧，然而最拙劣的建筑师，起首便胜过最巧妙的蜜蜂的，就是因为他于用蜂蜡建筑蜂窝而外^[1]，已在他的头脑中建筑着。……”（资本论，第一卷，考茨基版，333~334页）……[第240页]

……

五 社会的阶级差别及其政治的构造（政治的及法律的上层建筑）

……

中日战争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形式即国民党民族联盟问题，八路军战略问题，党的发展中新旧党员各种倾向、干部政策等问题。

“……，——在科学的立场上研究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忘却根本的历史的关系，就是要把一切问题，从某种现象如何在历史上发生，那一现象在其发展上经过了什么主要阶段的这种见地去观察，更从这发展的见地，去观察那东西，现在究竟怎样。……”[第271页]

[1] 毛泽东将“而外”改写为“以前”。

六 观念的上层建筑——社会的意识反映社会的存在

安朵拉托斯基^[1]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里面关于这一点，曾有所论及，他说：“思维为存在所决定。……我们所应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可和人类头脑中所想象的社会关系（即人类的观念），拿来相混同，应该就社会关系的真实方面，加以究明。这两种事实的差异，我们试从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步一步看去的时候，那怕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成熟而且实在的，而人类对于那种关系的意识却仍旧缺乏；而且我们就各个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不会详细的理解这件事说来，也就不难明白。最初，是关系成熟，然后意识发生，然后人类才理解关系。……”

先行后知
知难行易

七 社会变革的总过程——阶级斗争——经济与权力——从必然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王国

……

[1] 安朵拉托斯基（1878—1945），现译阿多拉茨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32年起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到了这个时代，所有一切生产手段，都移在社会的共同管理之下，关于社会的生产，本着人类的计划去统制，关于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本着人类的意识去调节，遂成为必要而且可能了。但是生产手段，一旦移在社会的共同管理之下，榨取他人的阶级，便不能存在，固而被他人榨取的阶级，也不存在，而阶级与阶级之一般的对立，遂被废止了。不仅如此，并且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一旦本着人类的意识去调节，那由两者间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自己运动”之自然史的过程，便被扬弃。一言以蔽之，在一切从来的历史上，成了动力的生产诸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成为人的表现的支配阶级与抑压阶级之间的斗争，都绝迹了。“于是人类社会的历史^[1]，便以资本家的社会形态而告终”。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开始描写人类的真正历史——如果对前史而言，可称为本史——的第一页前夜。……[第301页]

?

[1] 毛泽东将“历”字改为“前”字。

下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

第一章 商品

第一 为研究出发点的商品

六 出发点和到着点之间的辩证法的循环

……

……到了各个商品已不是表现为各个商品，而是“表现为全生产的观念部分”的时候，那当做最舍象的范畴之商品才产生。惟其是那样，所以那成为舍象的范畴之商品或商品交换，除了成为已经完成十分发展的资本家社会的一种“具象的活^[1]全体之舍象的一面关系外，绝不能存在”。……不但集合拢来，各个商品是社会全体之富，并且各个商品，无论和构成社会全体之富的分子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交换，在这一点上，各个商品，也具有代表社会全体之富的资格。实在，在具有那种资格的一点上，劳动生产物才变成商品，因此，它“不但表现为全生产的现实部

[1]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的”字。

分，并且还表现为全生产的观念部分”。换言之，就是各个商品中潜在着货币。……

……我们不是由于用思惟去分析鸡而发见卵的，可说最初就把鸡和卵都当做确定了的东西在探究，同样，最¹¹舍象的终点和最舍象的始点，都成为直接的东西现实地表现出来，而舍象的东西，就成为那具有丰富的多面性的具象物自身的某一面现实地表现出来，由于这一点，这两个东西，最初就是同时替我们确定了。在两个都是直接的确定了的一点上，便两个都不是依存于他方的东西。[第87~89页]

……

第二 分析商品而得的商品两个要素——使用价值及价值

一 引言

……

所谓分析，用列宁的话说，便是为了“认识统一物中充满了矛盾的构成分子”，“把统一物分解出来的事情”。但是，这却和分析自然现象不能用肉眼同，“当分析经济的诸状态时，显微镜和化学的

[1]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具”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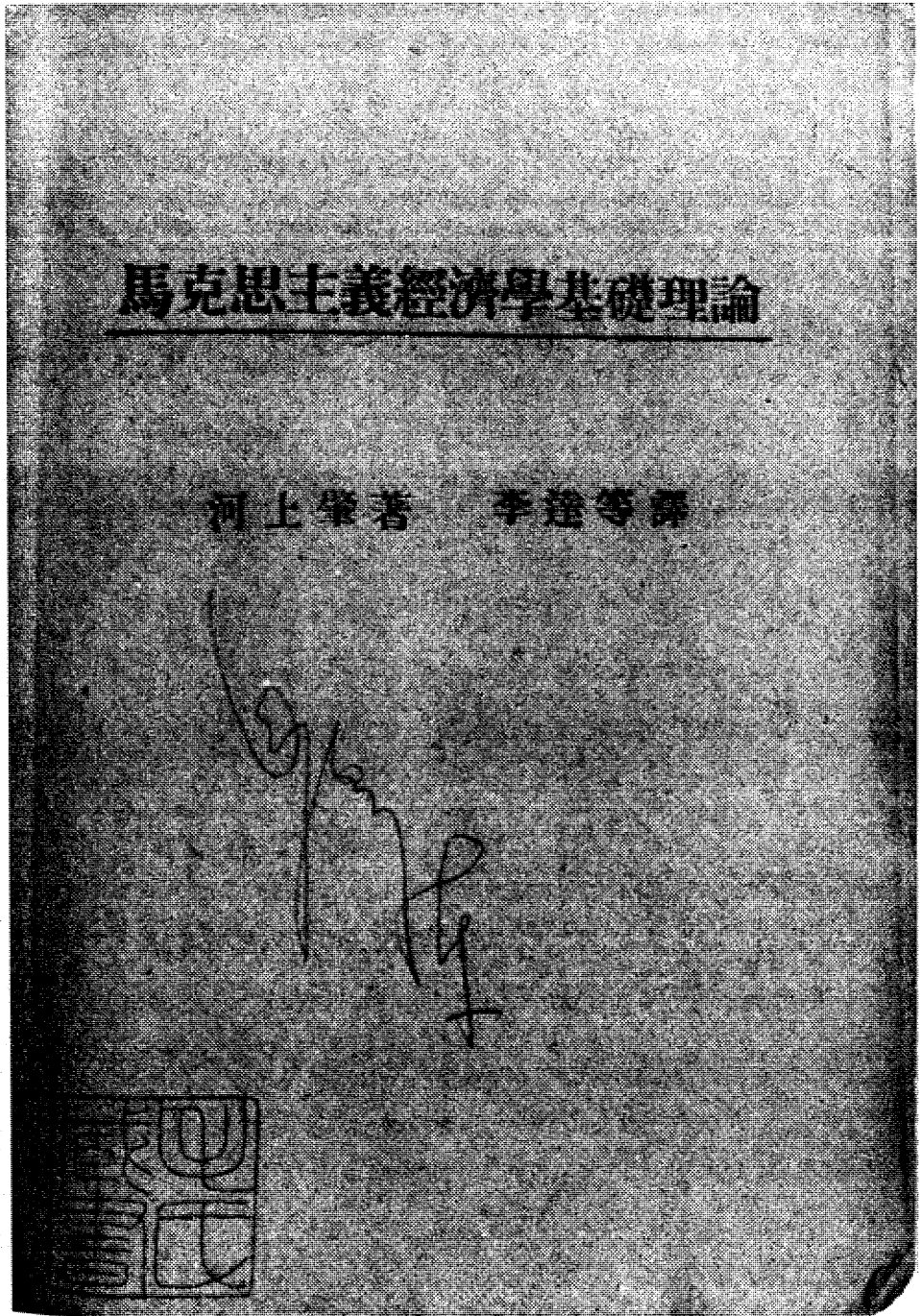
看见，必须用抽象力。 试验，都不中用，必须抽象力来代替这两者”。……[第95页]

四 成为价值的商品——其二，价值的分量

……

资本家社会的生产诸关系中最重要东西，就是资本家阶级和工钱劳动者阶级的关系，它在经济上——以后我们或许还详晰的观察——依存于劳动力的买卖，所以又是依存于劳动力的价值，仍是依存于劳动生产力的。^[1][第148页]

[1] 毛泽东将原文中“劳动力”和“劳动生产力”中的“作”字均删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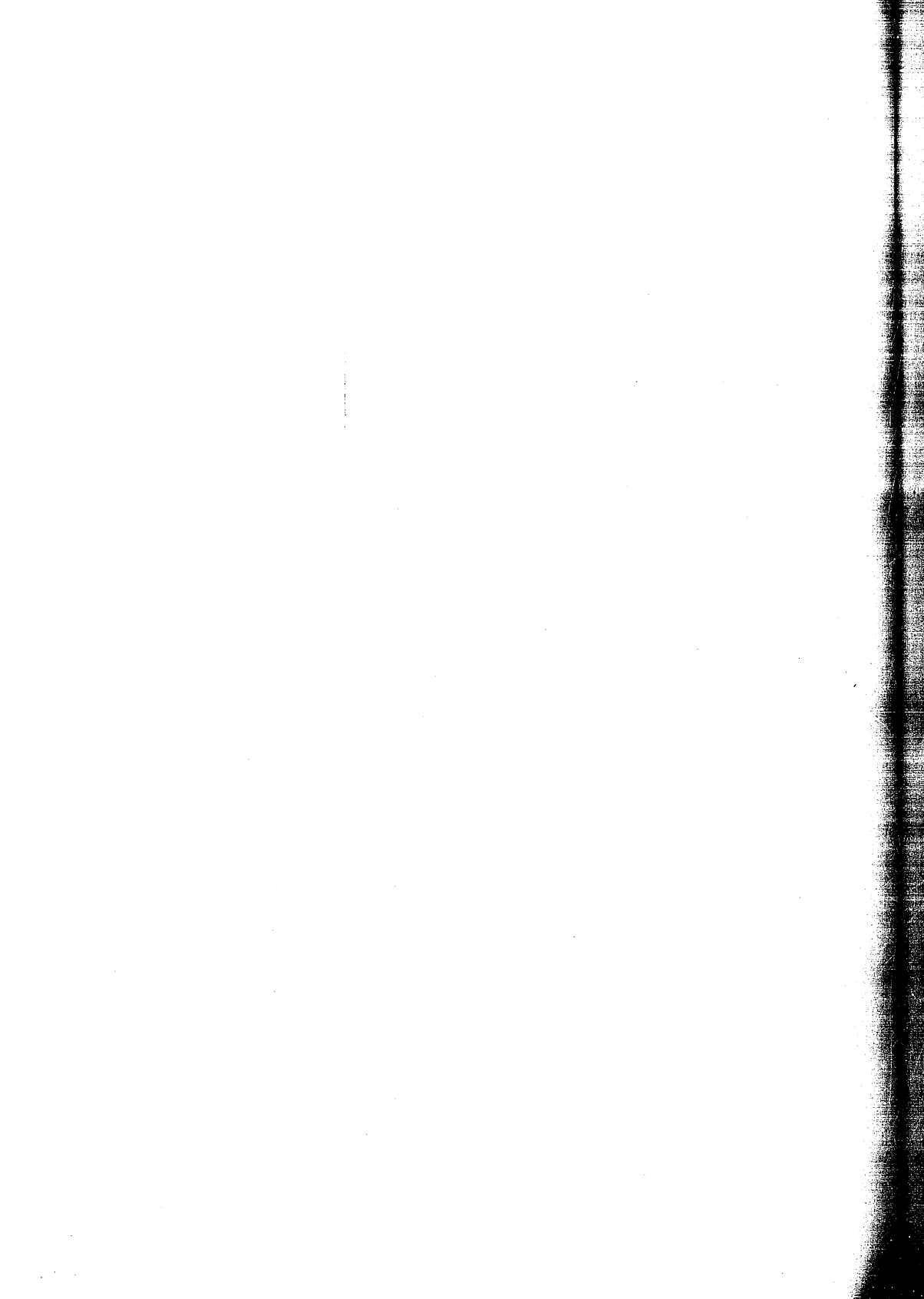


毛泽东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1940



1940年的毛泽东。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1940年1月1日)

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毛澤東先生爲

大衆日報週年紀念題詞

動員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衆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我們一定要自由，我們一定要勝利。

毛泽东为《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名^[1]

(1940年1月1日)

通信战士

通信战士

毛泽东为《通信战士》杂志题写的刊名。

[1] 1940年1月1日,《通信战士》杂志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是我军创办最早的军事专业刊物。毛泽东亲自为杂志题写刊名。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词

(1940年1月1日)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

你们是打天下的
千里眼顺风耳
耳

毛泽东为《通信战士》杂志的题词。

准备应付华中急变^[1]

(1940年1月5日)

项英同志：

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2]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中央书记处

五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致聂荣臻、彭真电^[1]

(1940年1月5日)

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聂荣臻、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陇东问题谈判的条件 给谢觉哉的信^[1]

(1940年1月8日)

觉哉同志：

(甲) 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 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 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 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毛 王 萧

八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萧劲光关于陇东六县问题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的信。

关于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的讲话^[1]

(1940年1月10日)

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对的。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我军占优势的区域要取攻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使顽固派孤立。

[1] 这是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山西新旧军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1月10日)

(甲) 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 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1] 这是毛泽东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

(1940年1月11日)

德怀同志：

征兵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如果是到军队中训练，办理二万四千人的征兵、粮食、被服等项，至少需六十万元，目前无此财力。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现在是经过自卫军，准备将来实行征兵制的过渡期。如同中央苏区那样的办法，五台山、太行山、陕甘宁边区都是这样。此复。

泽东

十一日

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1]的方针

(1940年1月11日)

德怀^[2]同志：

你陷日^[3]来电，书记处已有复电，谅收到。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4]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重要。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5]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边区问题有好转倾向，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3] 陷日，即30日。

[4]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5] 指陈士榘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

陇东九十七师已撤走，程潜、朱绍良^[1]在蒋^[2]命令下已表示和平，我们正派谢老^[3]赴甘为谈判代表。日本决定扶助汪精卫，日本在华军人的政策还是硬的，此事不能不影响国民党的态度，故好转可能还未断绝。现时日本内部的斗争，还是日本独占中国或者分出一部分权利给英、美这样一种斗争，军人的独占政策似乎占优势，日本正发生倒阁风潮，等几天就可见分晓。

泽东

十一日

[1]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朱绍良（1891—1963），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2] 蒋，指蒋介石。

[3] 谢老，指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曾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

吴玉章^[1]寿辰祝词

(1940年1月15日)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2]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3]，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4]就是一个，

[1]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2] 见毛泽东1937年1月30日为徐特立60岁生日写的贺信。

[3] 林老，指林伯渠（1886—1960），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指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董老，指董必武（1886—1975），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谢老，指谢觉哉（1884—1971），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4]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曾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文化界救国会，被誉为爱国老人。

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地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 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1940年1月16日)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作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作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我们边区有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磨

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1月16日)

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1]

(1940年1月16日)

晋西北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已大体上胜利了。^[2]阎锡山可能同国民党中央军进一步结合起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庞炳勋、朱怀冰^[3]的进犯不能不采取武装的抵抗，否则将丧失晋东南。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阎军赵承绶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放弃临县县城退向晋西南地区，至此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

[3]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月17日)

晋西北须立即建立新的政权，采用原来赵承绶的山西省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形式较好，迅速用民选办法推举续范亭为主任，各县的反动县长、专员应迅速全部撤换，委任新人。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月18日)

在山西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现在阎锡山有三万余旧军在吕梁山脉，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现在正准备派人去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但我们也准备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山西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1]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

[1] 《中国文化》是1940年2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1941年8月终刊。

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部分版本）。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

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

[1]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1]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

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

[1] 参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

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

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

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

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

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三大名著



印局分綏晉共中

1943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出版的《毛主席三大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

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但

[1]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1]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年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

[1] 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1929年7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1]，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

[1] 基马尔，又译凯末尔（1881—193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1922年战胜了希腊军队。1923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么？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

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感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大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1]，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

[1] 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勱及其一伙。张君勱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1923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勱被称为“玄学鬼”。1938年12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

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最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

[1] 参见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1]，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2]，“按劳分配主义”^[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

[1] 参见1924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 1933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3] 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

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〇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

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1]，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

[1] 汪精卫在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齏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齏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1]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

[1] 1925年3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

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東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

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

争^[1]，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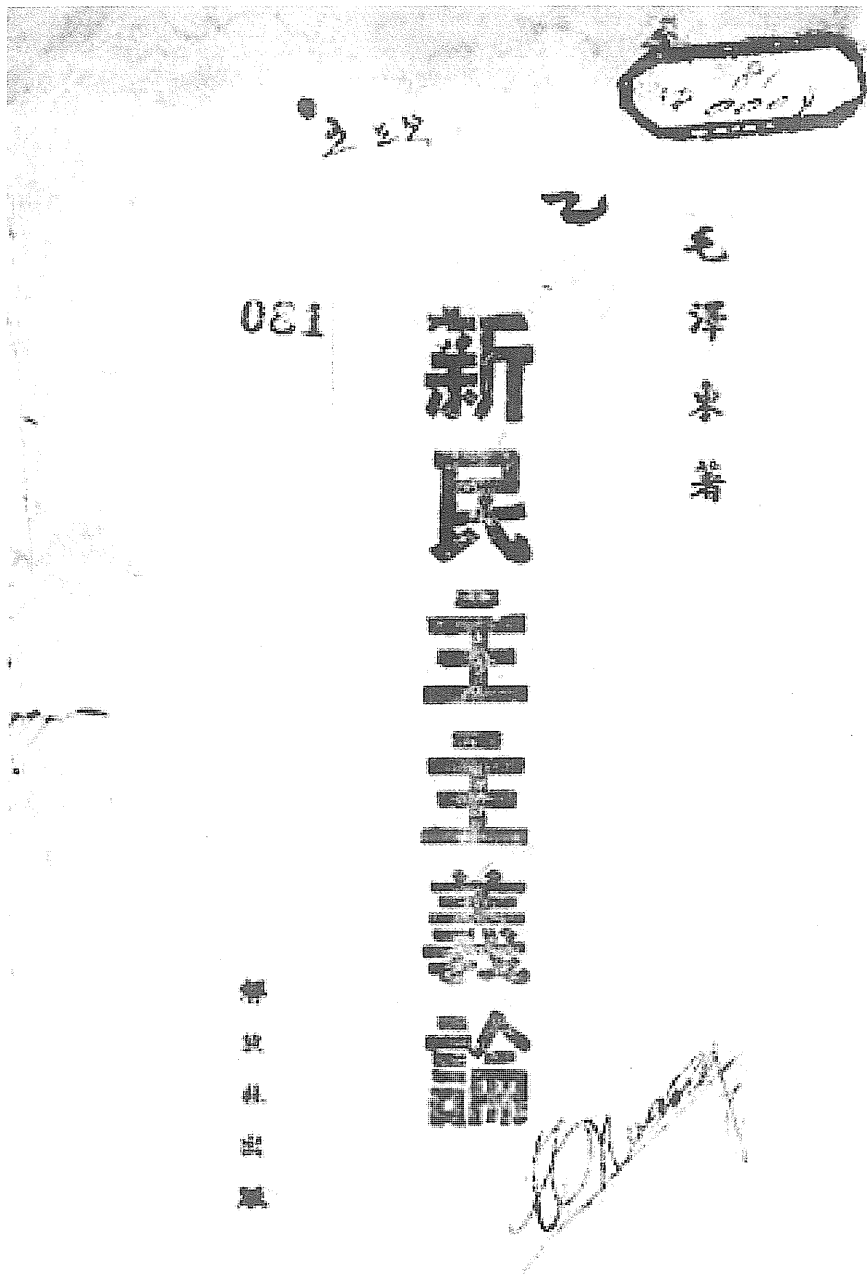
[1]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19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最早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

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1]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

[1]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6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6月3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

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

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勱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场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奋斗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

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1]（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

[1]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办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1]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

[1]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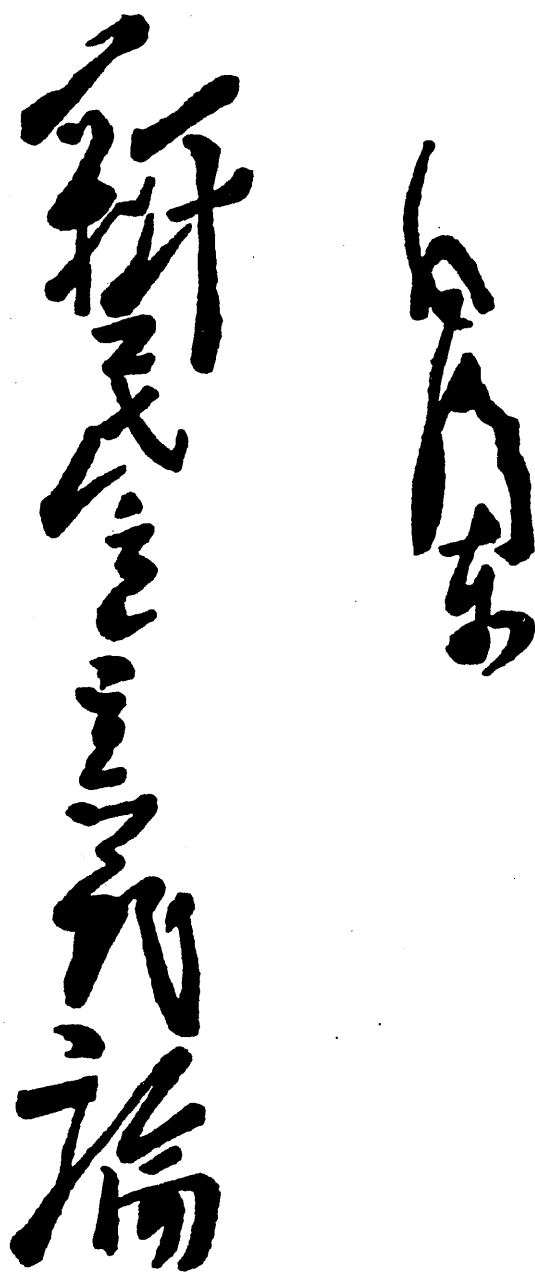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论》题写的书名。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毛泽东

毛泽东题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知識青年第四期

中國往何處去

聯華出版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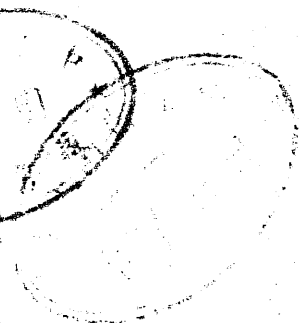
新中國現狀叢書
叶平著
新湖出版社印行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

毛澤東選集

新民主主義論



4-24

1949年2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

致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电^[1]

(1940年1月20日)

旧派在晋西北失败后，有可能再调兵反攻晋西北或由日寇进攻晋西北，而旧军则袭击后方。同时阎必与中央更加勾结，以谋夺取晋东南。因此晋西北必以突击方式，抓紧目前有利时机，进行一切工作。一切应当快做，迟缓就会失掉时机。晋西北新政权总机关，应当立即成立，愈快愈好。晋西北新政权的各种政策仿效晋察冀边区。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扬^[1]的信

(1940年1月21日)

周扬同志：

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我为盼！

毛泽东

二十一日

[1]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1937年9月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

给周扬的信

(1940年1月23日)

周扬同志：

我的感冒还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毛泽东

二十三日

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 成立两周年题词

(1940年1月23日)

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侵略战争。

毛泽东

祝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之成功。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

(1940年1月24日)

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

共 恒 抗 我 文 藝 人
振 奮 軍 民 爭 取 最
後 勝 利 ！
毛 澤 東

毛泽东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月24日)

一

我党过去的财政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了。羊毛不能一次搞光了，动员人力也是如此。

二

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步，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是坚持三军九师、二十三县，不能再让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 创刊一周年题词

(1940年1月25日)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

毛泽东

一面战斗
一面学习
百折不回
再接再厉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的题词。

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朱德等电^[1]

(1940年1月27日)

朱、彭、杨、贺、关、聂，彭^[2]：

(甲) 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任雷民^[3]，宋劭文，张文昂，韩钧及各地牺盟民青应继续不断打电给阎、梁、杨痛陈王陈孙赵^[4]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乙) 此间已用萧劲光名义向阎提议调停并指明陈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兵站线被消灭，八路伤兵被惨杀，晋东南七县八路人员被惨杀者七十余人，引起八路深为不安，但八路愿意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抗战，如阎愿意谈判则准备派人去谈。

毛 王

廿七日

[1] 原件无年、月，本文日期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2] 姓名全称是：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

[3] 任雷民，应为雷任民。

[4] 姓名全称是：阎锡山、梁化之、杨爱源、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

施德、朱、彭、贺、李、聂、刘、邓、(甲)唐一皮，戎子
 和，续范亭，任弼时，宋劭文，叶文昂，韩
 钧及各地牺盟民青社成员不断打电给
 周、梁、杨、~~痛陈~~王稼祥、赵、~~人~~、~~进~~、~~新~~、~~军~~、~~破~~
 地、~~牺~~、~~盟~~、~~侯~~、~~转~~、~~救~~、~~日~~、~~人~~、~~员~~、~~的~~、~~罪~~、~~恶~~、~~是~~、~~表~~、~~示~~、~~致~~、~~函~~
~~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
 免为敌人利用，~~致~~、~~周~~、~~杨~~、~~领导~~、~~团结~~、~~抗~~
 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乙)此间已用
 有、~~动~~、~~友~~、~~名~~、~~部~~、~~向~~、~~周~~、~~杨~~、~~等~~、~~提~~、~~议~~、~~并~~、~~指~~、~~明~~
 晋、~~支~~、~~队~~、~~被~~、~~攻~~、~~引~~、~~起~~、~~的~~、~~深~~、~~办~~、~~决~~、~~果~~、~~山~~、~~定~~
 战线被冲破，以致伤亡惨重，晋东、晋北、晋南、晋西
 又被侯、转、救、十、~~人~~、~~引~~、~~起~~、~~的~~、~~深~~、~~办~~、~~决~~、~~果~~、~~山~~、~~定~~
 继续团结抗、~~在~~、~~周~~、~~杨~~、~~等~~、~~提~~、~~议~~、~~并~~、~~指~~、~~明~~
 准备向人去谈毛五廿七日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掀起反共高潮。图为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朱德、彭德怀等电的手稿。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28日)

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1]：

甲、十二月九日中央曾有长电，要你们在山东全境及华中发展数十万军队，组织数百万自卫军。中原局方面已经了解正在进行，山东及一一五师方面尚无复电，不知你们同意否？能够办到否？

乙、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

丙、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按此大概目标，具体分期实现。据山东来说山东民枪甚多，应能实现此数，据胡服^[2]电告，中原方面半年可发展到十万，但具体计划，由你们决定之。

丁、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

[1] 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2] 胡服，即刘少奇。

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现在你们的自卫军还太少。

戊、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己、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磨擦。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而我应极力争取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乃是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对于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1]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

庚、国民党有加派军队进入鲁苏战区的计划，因此你们应加速自己的布置，要在他们未到以前，你们的阵地已经大体上巩固了。

辛、要使全党干部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书记处

一月二十八日

[1]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明扬（1890—1978），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

(1940年1月28日)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1]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

[1] 指1939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1940年1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1]

(1940年1月29日)

项、叶同志：

甲、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乙、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丙、经费绝无他项出路，全党均须自力更生。

毛 王

一月二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

在自卫原则下给进攻者以彻底打击^[1]

(1940年1月30日)

朱、彭，杨，刘、邓^[2]，并告朱、徐，陈、罗^[3]：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4]，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

[1]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数个县城。阎锡山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则于1939年12月初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也在冀南加紧向八路军进攻。这是毛泽东就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3] 朱、徐，指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和司令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

[4]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六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1]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中央书记处

一月三十日

[1] 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关于扩军问题的指示^[1]

(1940年1月30日)

今年扩军三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我们意见在老黄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残枪为原则。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扩军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 我之工作方针问题致朱德等电^[1]

(1940年1月31日)

朱、彭，杨，贺、关：

甲、据王世英处消息，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因此山西及反新派斗争可能一时期中处于麻痹状态中。

乙、我们应利用这种状态，进行下列工作：

(1) 巩固晋西北，把它五台区化。巩固新军，扩大我们的力量。

(2) 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向阎梁通电，痛切陈词，拥阎抗战，说明过去冲突是由通敌的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的。新军新派是完全防守的，现在新军愿和平解决，条件是：(一) 惩办祸首。(二) 划分新旧军驻防区域。(三) 抚恤新派死难人员及家属。(四) 坚决实行阎先生十大纲领，由晋东南、晋西北新派领袖分别出面。除通电外，还可向群众及各界人士发表宣言。(五) 停止屠杀新派人员并保证以后不发生同样事件。

(3) 八路军可向阎表示愿为和平解决而效力，此间已用萧劲光名义致电楚参谋长表示此意（此电已转你们）。我们意见，朱彭贺关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的电报。

亦可致电阎先生，贺关在晋西北应公开，师部回来理由是巩固山西抗战，调解新旧冲突，不愿坐视本师所创造出的晋西北根据地被瓦解。

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在和平无望，武装冲突又起时，我们取得政治上有利地位。因为社会人士更易了解冲突责任是在旧派身上，更对我会更表同情。

毛 王

一月三十一日

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1]

(1940年1月)

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4日在延安召开，12日闭幕。这是毛泽东为大会写的两则题词。

为《中国文化》题词^[1]

(1940年1月)

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的《中国文化》创刊号所写的题词。

延安青年文化界活动起来，
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文化》创刊号的题词。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

(1940年2月1日)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2]，在河南就闹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2]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惨杀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千余人。

确山惨案^[1]，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2]，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3]，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4]，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5]，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6]、外部的

[1] 确山惨案，也称竹沟惨案、竹沟事变。1939年11月11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1800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200余人。

[2] 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1939年12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集中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3]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从1938年以来，他就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1939年6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

[4]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1939年3月30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200余人。到1940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700余人。

[5] 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从1939年6月至9月，他先后多次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在鄂东的游击部队和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

[6] 1939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1]。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2]；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勱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3]。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

[1] 在1939年初至1940年6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

[2]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3]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1939年2月，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华中、华北各地，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强。这种压迫和进攻，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达到了高潮，被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在陕西、甘肃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大的军事进攻。在此以后，在1940年的二、三月间，蒋介石又指令国民党反动派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匪部，三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这次进攻被八路军彻底击败，国民党军的3个师被消灭，而蒋介石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就此被完全打退了。

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①，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抗击的日本侵略军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1943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64%和全部伪军的95%。

饭^[1]，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2]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

[1] “吃磨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

[2]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5元。

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

(1940年2月1日)

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

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勱、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

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三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论者谓已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均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

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构搆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搆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1]，明之魏忠贤、刘瑾^[2]。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3]。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

[1] 周兴、来俊臣，公元7世纪末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

[2] 刘瑾，公元16世纪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公元17世纪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

[3] 这里是指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反动军事首领蒋鼎文。

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亿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 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

(1940年2月1日)

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

[1] 这个决定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缘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知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

抗日战争就要失败。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的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如果能坚决地并具体正确地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

-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 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
- 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
- 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

汉奸；

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

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

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

十、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

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

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复王世英电^[1]

(1940年2月2日)

世英同志：

来电意见甚对，我们极力调解山西新军与旧军的冲突。谅新军会赞同的，惟旧军需停止进攻，阎锡山对新军须有安慰，否则冲突不已，妨碍团结抗战，望向阎锡山表示此意。

毛 王

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新旧军冲突问题给王世英的复电。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1]

(1940年2月3日)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诸先生勋鉴：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于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磨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然后携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鄙人等以事属离奇，未敢置信。顷接尊处电示，始知果有视察团之组织。复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四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类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恒源、张表芳等诸先生，亦无一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

[1] 这是毛泽东和陈绍禹（王明）、林祖涵、吴玉章关于“华北视察团”事给国民参政会的电报。

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犹忆前年十二月间，张君劢即曾著论主张取消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特殊化及取消共产主义。未几，汪精卫发表艳电，竟倡言反共。设该视察团之目的与汪、张无殊，尽可以汪张文件为蓝本，在渝作出大文，撰成提案，何必当此朔风凛冽之际，冒此严寒，多劳往返。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报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或曰，你们共产党所云，未免估计不当，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臢齷齪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若然，则鄙人等所言幸而不中，而国事实获进步之益，鄙人等当于该团来延安时，准备以陕北特产之小米饭、高粱酒，接待诸参政员同人，与之对雪举杯，畅论团结救国之大计，决不至慢待嘉宾也。敬祈贵处代为转达为荷。

此致

敬颂勋祺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林祖涵 吴玉章

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2月3日)

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决心从左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皖南部队准备在国民党许可下移至皖东。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下新四军行动方针问题致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给陈云的信

(1940年2月3日)

文章有用，并可在军政杂志上发表。文字上与某些观点上我认为不妥的，改了，是否妥当，请你自己酌定。题目不恰当，游击区的重心还是游击队，不是游击小组，没有游击队，游击小组是不能存在的。不宜太夸大游击小组的作用。

坚决彻底消灭石友三部^[1]

(1940年2月3日)

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2]。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二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二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0年2月5日)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

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为《中国工人》出版题词^[1]

(1940年2月7日)

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而斗争。
祝中国工人出版。

毛泽东

[1] 《中国工人》杂志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的一份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刊物。1940年在延安出版时，毛泽东同志曾亲自为《中国工人》杂志撰写发刊词并题词。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工人》创刊所写的题词。

为毛泽东新民主义
的中国人民而奋斗
祝中国人民出版
日快乐。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出版的题词。

为《中国工人》题名

(1940年2月7日)

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

毛泽东为《中国工人》题写的刊名。

《中国工人》^[1]发刊词

(1940年2月7日)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

[1] 《中国工人》月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1940年2月在延安创刊，1941年3月终刊。

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1]

(1940年2月7日)

延安《新中华报》自改为共产党机关报以来，已一年了。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没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报馆诸同志的直接努力，亦是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办好也是不可能的。但“好”是没有止境的，今年是第二年，我希望这个报纸进一步地好起来。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

[1] 本篇是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一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原题为《强调团结与进步》，其中第二段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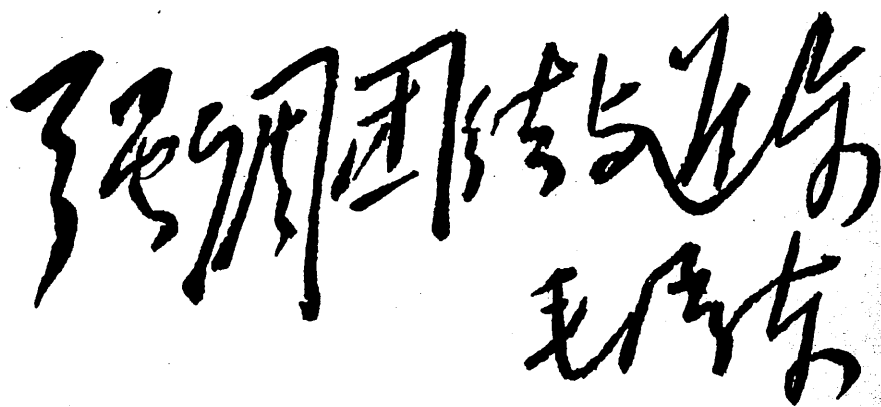
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1]、摧残牺盟^[2]和惨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3]，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于《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纪念之时，书此致其希望之忱，并望与全国同胞共勉之。

[1] 在山西进攻新军的事件。

[2] “牺盟”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9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并在晋东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共产党员、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3] 从1939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A piece of calligraphy in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bold, expressive cursive style. The main text reads '强调团结与进步' (Emphasize unity and progress). Below it, the signature '毛泽东' (Mao Zedong) is written in a similar style. The calligraphy is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毛泽东题写的“强调团结与进步”。

为《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题词^[1]

(1940年2月7日)

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由陕甘宁政府机关报改成中共中央机关报一周年而写的题词。

抗戰團結進步，
三者不可缺一。
毛澤東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的题词。

复南方局电^[1]

(1940年2月9日)

中央同意南方局所说现在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心，已不是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军队扩编为九个师的问题，而是全国磨擦的问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南方局电的部分内容。

挺进军的战略任务^[1]

(1940年2月11日)

萧克同志及挺进军^[2]军政委员会诸同志，并告朱、彭，杨，贺、关，聂，彭^[3]：

中央规定你们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4]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5]、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这同你们所提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这些目前的任务是一致的。

因为你们区域敌情特别严重些，你们扩大军队的方针，仍应是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并告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挺进军，指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939年2月在北平（今北京）西部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组成。其任务是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3] 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4] 平西，指北平（今北京）以西地区。

[5]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在巩固基础上，力求一步一步地扩大。如同你们发展根据地的方针是在巩固基础上一步一步扩大是一样的。

你们要注意扩大随营学校（或办抗大^[1]分校），分为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老兵、老干部，尽量抽调来训练，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大量地放手地从平、津、冀东各地招收革命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只有自力更生地大量创造干部，才能担负创造冀热察^[2]三省伟大根据地的任务。

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在抗大分校内设立行政工作班，教授政权工作及财政经济工作，这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中央及军委

二月十一日

[1]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抗大共举办八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宣告结束。

[2]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彻底消灭顽固派，极力争取有希望之人^[1]

(1939年2月11日)

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沈鸿烈^[2]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磨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3]是其最坏之一部）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4]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河北磨擦事件望刘、邓^[5]亦照此办理。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

[3]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4]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5]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指示

(1940年2月12日)

朱、彭、贺、关、滕^[1]：

甲、据南方局电，叶剑英见程潜，程表示如下：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的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已电朱德转告新军，嘱其派人来行营商议等语。

乙、此间用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斗争，并愿派人见阎，〔阎〕回电辩护其讨伐新军及攻击陈支队之不得已，但无坚决不能调解之语气，对八路军亦无强硬语气，对派人见闻谈判则之〈云〉，我并不拒绝，如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等语。

丙、我们意见：

1. 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因为这些都是不利的。

2. 如朱彭接到行营电报，即转告新军领袖，要他们把行营的电报通知阎，表示新军仍归〈旧〉拥阎，不超过阎而与中央联络，新

[1] 指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

军绝不宜派代表到行营或重庆去商议。

3. 与阎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书〈式〉〔出〕面进行，而新军领袖则用电报与阎联络，表示希望新旧军恢复团结，共在阎领导下一致抗日。电报中只提此种愿望，不提处罚陈长捷等条件，语气须和缓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使阎与旧军觉得有希望，以利萧劲光前去谈判。

4. 于涛可留他在行西北住两星期，那时如有用他之处，再决定要他去秋林。

5. 新军内部之团结，特别重要，梁化之屡次放出空气，新军三月内必有分化。此事请你们严重注意，新军应当独立自主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应多给以帮助。

毛 王

二月十二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与口号 致朱德、彭德怀电

(1940年2月14日)

朱、彭：

(甲) 你们八日电悉，你们的决心与部署是很对的，望坚决实行。(乙) 在实行时我仍取自卫立场。(丙) 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枪口对外消灭磨擦”“进攻八路军的就是汉奸”“打倒从八路阵线后面进攻的汉奸”“中央军八路军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山西新旧两军团结起来停止内争一致对敌”“拥护蒋委员长阎长官卫长官抗日到底”等口号，再加上中央昨电之五个基本口号(此五个基本口号应到处发布)。(丁) 将发现打倒八路军等汉奸口号事件电告蒋卫。

毛 王

十四日廿二时

为应云卫题词^[1]

(1940年2月15日)

抗战、团结、进步。

[1] 应云卫 (1904—1967)，戏剧、电影导演，曾导演抗战时期第一个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日的电影《塞上风云》。该片公映时，毛泽东为之题词“抗战、团结、进步”。

为吴茵题词^[1]

(1940年2月15日)

前进。

[1] 吴茵 (1909—1991)，原名杨瑛，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这是毛泽东给吴茵写的题词。

为《中国文化》题名^[1]

(1940年2月15日)

中国文化

[1] 《中国文化》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1940年2月15日创刊。毛泽东对这个大型综合性刊物格外关心，他不仅题写刊名，还为它题词祝贺：“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奋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也交给《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发表。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毛泽东为《中国文化》题写的刊名。

致高双成电^[1]

(1940年2月16日)

转告续范亭来电称：已决定继续保证每月过河粮食六百大石^[2]，敬希查照。

[1] 这是毛泽东致驻榆林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电的主要内容。

[2] 此前，高双成曾致电续范亭请开粮禁。

在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0年2月19日)

现在顽固分子要倒退，全国宪政运动就要促进，使其短期实现。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

打日本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不但做事，而且应该打头，青年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国民大会中要有青年才好，延安青年开的会，是全国青年正确的方向，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致程潜电^[1]

(1940年2月19日)

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

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2]

[1] 这是毛泽东为萧劲光起草的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电的主要内容，电报中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速将陕甘宁边区境内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撤走。

[2] 后来程潜回电，同意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应由边区政府委派。这样，国民党政府任命的那些县长，便一个一个离开了边区。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1]

(1940年2月20日)

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中国国民党，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抗日民众团体，各报馆公鉴：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于二月二十日举行成立大会，谨将本会对于宪政之意见，宣言于次，敬祈政府采纳实行，并希各界人士共同促进，俾真正之民主政治得以实现，抗战前途，实利赖之。

一曰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溯自民国成立，至今二十九年矣，然民国其名，专制其实。袁、冯、段、曹诸辈无论矣，国民党当政以来，因循故辙，亦无改进。所以然者，训政之空言高唱入云，而未以发扬民意反抗帝国主义为唯一方针也。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有云：“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盖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善哉言乎，设此宣言见诸实行，则内战之惨祸可以不作，外患亦无自而入矣。不幸此等至理名言，竟被束之高阁，而一党专政之厉行，反美其名曰训政。实则中国境内，自南至北，自通都大邑至穷乡僻壤，几曾见训正一人，训好一事。而多年训政之

[1] 这是毛泽东和吴玉章等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

结果，则徒见贪官污吏，恣意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国家之纪纲，民族之元气，几为之斫丧殆尽，而外患乃得乘隙而入。抗战以来，全国奋起，为救亡而战斗，当前之绝大问题，为如何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论者乃欲将宪政之实施与发扬民意驱除日寇之民族存亡大问题，划然隔绝，不视宪政为救亡图存之工具，而视宪政为涂饰耳目之巧计。于是人民之宪政运动被禁止矣，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被钳制矣，国人皆曰可废之训政被宣布继续实行矣，抗战以前举办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被认为不须改选矣，不满人意之国民大会组织法被认为有效矣。凡此诸端，均属违背人民之公意，不合抗战之需要，本会同入特表示坚决之反对。本会同入敢断言，以此等办法实施宪政，决不能解决对内对外之任何问题。自非根据民意，加以彻底改变，不足以回人心而利抗战。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一也。

二曰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抗战以前举办之国大代表选举，虽亦不无公正之士，然所谓选举者，大多属于伪造，盖当时指导选举者为今之汉奸褚民谊，而党部则暗中包庇一切，黑幕重重，贻笑中外。其中汉奸敌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一而足。以此等代表集会制宪，必为一篇毫无用处之官样文章，以此等代表集会行宪，必为一次换汤不换药之一党专政。夫欲为所欲为，则亦为之已耳，何必多此一举，以宪政之招牌为掩饰乎？本会同入对此特表示坚决之反对。同时建议政府，彻底修正国大代表选举法，重新选举代表。盖必如此，方与团结抗战之需要相适合。否则南辕北辙，贻笑大方，断非民族国家之福。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二也。

三曰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

权力机关。按原组织法规定国民大会职权仅为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施行之日期，会毕即任务终了。此其用意，在于不欲宪政之真正见诸实行，不欲国民大会成为救亡图存之权力机关，仍属一党专政之欲念作祟耳。本会同入对于此种不合抗战需要之国民大会组织法，坚决不能同意，主张彻底加以修改，主张国民大会应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一，国民大会于制定宪法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外，应为执行宪法之机关。第二，国民大会应有决定内政外交基本方针之权。第三，国民大会应有选举政府监督政府与罢免政府人员之权。第四，国民大会应有制定国家法律之权。第五，国民大会应设常驻机关，执行大会闭会期间之职务。盖必如此，方与目前危险时局之需要相适应，而使国民大会不变为敷衍门面之装饰品。如谓宪法由何项机关执行尚待宪法规定，国民大会组织法不能预先赋予国民大会以行宪之权力，此自欺欺人之谈也。盖国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孙中山先生所规定。孙先生尝云：“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国民大会而非行宪之机关，试问尚有何种机关足当行宪机关之任乎？凡事之成，待于诚意，宪政而无诚意，不如不谈为佳，而诚意开放政权，诚意实行民主，诚意唤起人民管理自救救国之事业，而不作敷衍一时之计，乃为召集国民大会之根本前提。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三也。

四曰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宪政而无民众运动，民众而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抗日党派而无合法存在与合法活动之权利，则一切所谓宪政，不过空谈一阵，毫无实际成效可言，有断然者。循此不变，则不论宪法条

文如何美备，亦不过一堆毫无意义之黑字。不论宪政名词如何夸张为自己早亦已提倡，亦不过一党一派独占政权之掩饰。而如有改弦更张之诚意，与民更始之决心，则必自允许人民及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有自由讨论宪政，自由选举国大代表始。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四也。

凡此四端，为本会之主张，亦即全国人民之公意，本会同入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虽有种种阻碍，终必达此目的。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秋，国家民主化，实为救亡图存之至计，而国共两党及全国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之共同努力，必能逐渐达到民主宪政之途，此又本会同人所深信不疑而愿为我全国同胞掬诚相告者也。兹当本会成立之始，敢竭所怀，质之当世，有志之士，盍兴乎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吴玉章

理事	毛泽东	陈绍禹	张闻天	王稼祥	康生
	陈云	邓发	林伯渠	李富春	高岗
	高自立	罗迈	萧劲光	谭政	张邦英
	谢觉哉	柯庆施	滕代远	张浩	孟庆树
	冯文彬	张琴秋	丁玲	曹一鸥	艾思奇
	周扬	王学文	许光达	吴亮平	陈伯达
	南汉宸	李初梨	扬松	何思敬	赵毅敏
	陈康白	傅连璋	高朗亭	曹菊如	饶正钫
	王林	叶季壮	雷经天	白振邦	高述先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

(1940年2月20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行为，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1]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

[1] 吴老，指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

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1]，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

[1]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1]？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2]，第四个是冯国璋^[3]，第五个是徐世昌^[4]，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

[1] 1923年10月，北洋军阀曹锟用5000银元1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2]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3] 冯国璋（1859—1919），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1917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4] 徐世昌（1855—1939），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1918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1]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2]，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

[1]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2]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

[1]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称自己为皇帝，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6月6日死于北京。

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反磨擦斗争的形势^[1]

(1940年2月20日)

德怀同志：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

泽东

二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反磨擦斗争的形势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0年2月21日)

注意吸收一批不左不右之中间派人士参加政府与文化经济工作，以便争取他们，任何党外机关只要保证我们及左派的领导就行了。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2月23日)

贺龙致阎锡山电，用语太硬，我们已加修改。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但晋西游击战争仍应积极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40年2月24日)

华中应立即成立抗大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华中大批青年学生。

由晋东南开抗大分校一部到华中，以作华中学校之基础，已开拔否，望告。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华中建立学校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对新军工作问题的指示^[1]

(1940年2月24日)

新军部队绝对不应该编入八路军，应注意巩固新军干部的团结。
晋西北施政大纲六项，没有提到坚决实行阎锡山的十大纲领，
是一个大缺点。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新军工作问题致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并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2月28日)

上海党的方针，第一是乡村工作，并建立政权及军队，要组织十万军队；第二是上海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应非常谨慎，乡村工作要放手大干。应组织上海市委及外县工作委员会。要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到政治局报告一次工作。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2月)

一

过去参政会只是请客，决议不能实行，反共的决议便实行了。如果不出席，我主张一个也不去，董老也只去一次，首先将我们各种提案送去。我们不怕决裂就不会决裂，要决裂我们怕也会决裂，这是一个两大力量斗争的问题，社会物质的问题。我们对参政会要提以下几个提案：（一）反汪，（二）宪政，（三）团结，（四）参政会决议要实行等。

二

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为好，维持三角鼎立的形势为好。新旧军已经不能再打了，今后是僵局或是和平，我看僵局是过渡的阶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山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出席。

段，和是确定了的。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去谈判的人以萧劲光、王若飞^[1]二人为好。

[1]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

帮助萧克挺进军巩固平西根据地^[1]

(1940年3月3日)

贺、关：

萧克挺进军方面，盼望你们经常加以注意，给以子弹与干部（学生）的帮助。该部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这在战略上是有颇大意义的。如果该部能完成此种任务，不但对晋冀察边区是直接的配合，即对雁北与晋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也是有很大配合作用的。那里的困难条件更多，故须酌量给以帮助。

泽东 稼蔷

三月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德等的电报。

第一二〇师 总指挥部
B区 B101 F103

贺龙 萧克挺进军方面，希望你们统率
加以注意，~~在部队中~~ 给以子弹与干
部（批）的帮助。① 该部任务是巩固平
西根据地，发展整军游击队，这在实际上
是有战略意义的。如该部能完成此种任
务，不但对根据地巩固有极大意义，而且对
此根据地之创造也是有帮助的。

王稼祥 萧克 三月
那儿的困难条件太多，
故须给以帮助。②

要帮助
帮助巩固

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的手稿。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3月4日)

一

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苏联是新新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

二

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磨擦饭的等，是全国的模范，是取消不了的。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边区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宪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三

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

四

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磨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

致八路军、北方局等电^[1]

(1940年3月5日)

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我们及新军应乘此次同阎锡山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彻底打击蒋介石企图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阎锡山发函电及宣传联络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致八路军、北方局、第一二〇师的负责人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1940年3月5日)

德怀^[1]同志：

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2]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3]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四人及陕蒋^[4]、甘朱^[5]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指国民党统治集团1939年年底开始在河北、山西发动的大规模军事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3] 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陕蒋，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蒋鼎文。

[5] 甘朱，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的朱绍良。

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二十三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和绥远^[1]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2]、鲁、豫、皖四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3]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4]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

[1] 绥远，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2] 直，指直隶省，1928年改名河北省。

[3] 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牺盟，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9月18日成立。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4]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1]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2]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3]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 稼蕃^[4]

三月五日

[1]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高树勋（1898—1972），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丁树本，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庞炳勋（1879—1963），河北新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范汉杰（1895—1976），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靖国（1891—1952），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2] 磁、武、涉，指河北磁县、武安和涉县。

[3]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4] 稼蕃，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1]

(1940年3月5日)

萧劲光、王若飞在秋林镇住四天，受到极大欢迎，谈判是成功的。

今后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的抗战。

为保证此种政策的实现，双方商定划区作战的条件是：在晋西以汾离公路^[2]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3]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的主要内容，电报通报萧劲光、王若飞同阎锡山谈判的经过和今后对阎的革命政策。

[2] 即汾阳到离石的这段公路。

[3] 即临汾到屯留的这段公路。

致王震电^[1]

(1940年3月5日)

靠近榆林的米脂及佳县许多中间势力的集中地暂时不要边区化，应维持现状。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绥德、吴堡、清涧、安塞四县也应是逐渐大体上的边区化，不是说和老边区一模一样。对友军、对绅士和对顽固派完全不同，你们须注意研究这些态度问题。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和缓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项英等电^[1]

(1940年3月5日)

对于蒋介石令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开之类的无理命令，应一概置之不理。

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磨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项英等电的主要内容。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

(1940年3月6日)

(一) 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二)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三) 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四)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五)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六)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七) 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八) 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九) 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十) 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份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政权建立已久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和冀南区，应照此原则重新审查自己的方针。在建立新的政权时，一概照此原则。

(十一)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十二)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十三) 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十四) 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的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中。

对上海工作的指示^[1]

(1940年3月6日)

上海工作，城市工作较好，乡村工作对国民党过于让步，没有积极建立政权与军队。东南局工作同志没有大大发展政权、军队的决心，现在应采取华北路线，大大地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刘长胜报告上海工作后对上海工作作出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给蔡元培家属的唁电^[1]

(1940年3月7日)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子民先生家属礼鉴：

子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

阳

[1]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这是毛泽东给其家属的唁电。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1]

(1940年3月7日)

朱、彭、杨：

此时应对卫立煌^[2]有所让步。在此次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山西之临汾、屯留、平顺及漳河、河北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之地位。在汾离公路^[3]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持阎之地位。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2]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汾离公路，即汾阳到离石这段公路。

致聂荣臻等电^[1]

(1940年3月8日)

聂、彭、舒：

同意成立以邓华为司令员的第五军分区，开展察南、雁北工作，同意陈漫远^[2]去平西，任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主任。

毛 王 谭

三月八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给聂荣臻、彭真、舒同等的电报。

[2] 陈漫远（1911—1986），广西蒙山人，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1]

(1940年3月9日)

伍、李转洛阳刘、袁二同志：

(甲) 各电均悉。目前并不是什么由小决裂到大决裂，你们在外商谈要沉着、坚定，静待指示。关于晋东南问题，由朱、彭答复你们以归统一。关于整个方针问题，子久可于本月十八日到西安与林老见面，接受指示。林老约一星期后由延动身去西安。(乙) 袁见卫先生时，可告他中共中央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始终不变。对蒋（介石）、程（潜）、卫（立煌）、阎（锡山）诸先生领导抗战，深表敬意。惟对一部分不讲合作、专讲磨擦的人极为不满。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边区不加承认，对华北不承认抗日政权，对全国不承认党派自由，对宪政采取压制政策，对舆论剥夺一切自由，深表不满。希望卫先生转达蒋先生公平处理，合理解决，是所盼望。

毛泽东

九日午

并告朱、彭、杨

[1] 这是毛泽东给伍云甫、李涛转洛阳刘子久、袁晓轩的电文。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处长。

给王枚的信^[1]

(1940年3月10日)

王枚同志：

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日

[1] 从1939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军民每人都要参加种粮纺棉工作。毛泽东也分得一块土地进行耕种，一有时间，他就拿起锄头干起来。后来，由于毛泽东工作太忙，延安农民王枚主动替毛泽东代耕，并把代耕所得交给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给王枚的复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

(1940年3月11日)

(一) 目前的政治形势是：(1)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2) 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3) 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对中国抗战依然取积极援助政策。(4) 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5) 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6)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三）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五）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

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不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

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六) 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内，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七) 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

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

(八) 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九) 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 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 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 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 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 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致琼崖部队领导人电^[1]

(1940年3月11日)

应坚决改变过去依赖国民党的方针，不依靠国民党发饷，要自力更生，使部队尽量扩大。并依靠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打击敌伪。

[1] 这是毛泽东致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领导人电的主要内容。琼崖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领导的，以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当时叫做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1947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

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1]

(1940年3月14日)

朱、彭、杨，刘、邓，左、黄，陈、罗，徐、朱：

(甲) 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乙) 目前山西、河北的反磨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三月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左权、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徐向前、朱瑞的电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0年3月14日)

在新旧军斗争停止后，新军、新政权、牺盟对阎应有一定程度的服从命令和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我党在新军、新政权、牺盟中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不应当什么都同八路军一样，对其中的党员亦不能一开始要求过高，而是逐渐引导向坚定的党员方向走。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广泛印发讨汪救国通电^[1]

(1940年3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2]，于删日^[3]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凡各机关、学校、军队、报馆、民众团体、社会闻人每处每人寄发一份，在友军中尤应多寄，凡军师旅团长均须多方寄送。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勿误为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起草的发给各地的电报。

[2] 汪，指汪精卫。汪于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9日）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年底和日寇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伪傀儡政权。1940年3月15日，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率所属全体将士发出了讨汪救国通电。通电说：汪逆登场，全国震忿。德等率部深入敌后，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近日以来，敌伪所至各地，竟敢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号召和平反共。夫所谓和平即投降也，反共即灭华也，固已昭然若揭。然一部分丧心病狂之人，随声附和，亦复所在多有。欧战扩大，国际阴谋分子与敌伪沆瀣一气，企图建立东方所谓反共阵线，抗战危机，千钧一发。当此之时，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实行反共，而以反共为投降之准备步骤，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其明证也。故

居今日而言，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线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敌人近在中条山脉附近，设置无线电广播，倡言国共即将分裂，中国即将内战，呜呼！是何言欤！！夫敌之厚者我之薄，亲所痛者仇所快，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惟求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磨擦，反对内战，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以我中华土地之大，人口之众，乘敌寇衰竭之时，遇欧战方酣之会，如能加紧团结而不自坏其长城，再接再厉而不自丧其勇气，则抗战未有不胜，建国未有不成者。德等不敏，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尚祈各界先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共救危亡，临电不胜屏营企祷之至！

[3] 删日，即十五日。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十五韵的“删”字来代替十五日，称删日。

考虑作必要让步，避免破裂两党团结^[1]

(1940年3月15日)

朱、彭二同志：

蒋、卫^[2]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讯，请兄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考虑对蒋、卫作必要让步，避免因此破裂两党团结。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

毛 王
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保护两党团结，作出必要让步问题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指蒋介石、卫立煌。

坚决阻止李文军渡河^[1]

(1940年3月15日)

胡宗南之中央军第九十军三个师，由李文率领已全部进到大宁之井沟镇及蒲县、乡宁之线。该军有秘密绕进大宁、永和、石楼一带，偷渡黄河，进攻陕北之企图，我河防部队有坚决阻击该师渡河之任务。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萧劲光致王震、郭鹏等并告贺龙、关向应、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卫立煌电^[1]

(1940年3月15日)

目前抗日局面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巩固，此为国人所期望，亦先生与弟之素志，延安面叙之意，固始终如一也。惟地方磨擦事件日益加多，如不加以调整，实于抗战不利，除电八路军诸同志注意外，请先生亦作合理之处置，俾一切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致卫立煌电的主要内容。3月15日毛泽东将此电报发给伍云甫，嘱其转袁晓轩面交卫立煌。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给全国各台电的指示^[1]

(1940年3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于十五日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在友军中尤应多寄，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秘书处起草的给全国各台电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1940年3月16日)

德怀同志：

元电^[1]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2]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3]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4]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

[1] 指彭德怀1940年3月1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2] 李品仙（1892—1987），广西苍梧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3] 指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的豫皖苏边区和胡服（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4] 蒋，指蒋介石。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目前华北斗争，亟应自动告一结束，否则有转入被动危险。我军政治上一经转入被动，蒋介石即会在政治上向我反攻，大肆宣传，说我无理，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大不利，过去的有理地位反而丧失了。朱怀冰事件^[1]，蒋亦将借题发挥。何应钦^[2]已在参政会^[3]常驻会议报告了一次。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请考虑见复为盼。

泽东

十六日

[1]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集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八路军击败。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3] 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咨询性机关。为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参政会。

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大会上的讲话^[1]

(1940年3月16日)

今天开这样的大会，很高兴。

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我们女同胞，现在不但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顽固分子土豪劣绅的欺侮，而且还受着那个不开明的男人的欺侮……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自由平等，不准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要自由、平等，全国妇女就要加强团结起来，几万万妇女结成一个团体，这力量就要大得多，大家应当齐心协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我们要准备干他十年八年，要求得一切问题的解决，求得一切痛苦的解决。妇女解放一定会胜利的。

延安的妇女今天有这样的自由平等，能开会、能讲话，必须要全国妇女都能这样做，延安妇女应当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奋斗、努力……

[1] 《新中华报》的报道特别注明，因天气和防空的原因，纪念大会推迟至3月16日举行。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复朱德等电^[1]

(1940年3月19日)

今后八路军坚守平顺、漳河线，不再退让；卫立煌^[2]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考虑择地与卫会谈。如决定，请将陕甘宁边区、扩军补充、增饷、新军、河北及操之过急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盘提出，托他转告蒋介石。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2]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

(1940年3月19日)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1]：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2]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3]可以腾出给你处，

[1] 朱、杨，指朱德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

[2] 曹菊如，当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

[3] 李六如，曾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

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1]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2]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四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3]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1] 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有过磨擦。

[2]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

[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巩固中央与晋东南及晋察冀之联络^[1]

(1940年3月19日)

朱、彭，滕，贺、关，聂^[2]：

为巩固中央与晋东南及冀察晋之联络：

(一) 请贺关、聂荣臻同志负责保证晋西北与军区之交通。由军区指定部队向西行动，直达同蒲路，由贺关指定部队向东行动，且与聂军区向西行动之部取得联络。如此路不巩固，有使整个华北与延安后方隔断的危险。如何布置，望电告。

(二) 中央与晋东南联络，因垣曲被阻，而晋西南之兵站线（原因中央系九十军到达该区）一时无法建立，因此发生重大困难。请彭、贺关派队侦察向北开展，建立晋西北直达晋东南的交通线，由榆次、平遥间通过同蒲路。如何望告。

军委 毛 王
皓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滕，指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在晋西北指挥反顽斗争。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任务^[1]

(1940年3月19日)

国平同志：

甲、十日电悉，甚慰。以后望多打电报，告诉我们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乙、关于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一、二、三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十万左右人枪，使四、五、六及李支队^[2]在一年之内扩大至十五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派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破坏敌军工作，积极瓦解敌伪军。以上这些积极方面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如何保证实行，均望逐一见告。

王 谭

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的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

[2] 李支队，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

关于晋冀两省磨擦终止后团结友军 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1]

(1940年3月20日)

朱、彭，杨，刘、邓、左、黄，陈、罗，朱、徐，程、宋：

甲、蒋、卫调丁树本渡河，应让其渡河，不加阻碍，不可向他打一枪。

乙、对庞炳勋、于学忠及其他各中间派应以尊重，并加紧联络。

丙、对朱怀冰俘虏应加优待，特别优待其官长和眷属，同时注意收集国民党下达该军的各种反共命令计划文件。从石友三部俘虏官中，亦应收集此种材料，此项材料十分重要，将来大有用处。

丁、对中央军进行有系统的团结，联络争取说服工作，表示我们愿与他们团结抗战到底，拥护蒋委员长与卫长官，此次对朱、石还击完全是迫不得已。

戊、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毛 王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左权、黄克诚、陈光、罗荣桓、朱瑞、徐向前、程子华、宋任穷的电报。

援助新四军创立 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1]

(1940年3月21日)

朱、彭，杨，并告陈、罗，徐、朱，刘、邓，彭，胡，项^[2]：

关于援助新四军。

甲、安徽主席李品仙^[3]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4]、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我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在此种情况下，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彭，指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指胡服，即刘少奇。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乙、除具体部署请朱彭速作决定外，兹将该地情况综告于下：

(一) 李品仙被某方收买，此次赴皖，某方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二) 李到皖后，立即改组省府，解散一切进步团体。受训学生三千余人不甘压迫，纷纷跑到新四军，各县捉人杀人之事无地无之，安徽政权现已极端反共化。(三) 李品仙为武力解决新四军，除调两个师至皖东、淮北外，又从鄂北再调一个军，其第一七二师由鄂西向皖西移动中。(四) 三月四日至七日，皖北行署主任李本一奉李品仙令，率二千余人，分三路进攻我驻在定远南部之新四军及江北指挥部，目的在消灭该指挥部，屠杀胡服、张云逸诸同志。经我各路坚决反攻，将其击溃，获枪数百枝，俘虏数百人。(五) 桂军一部及其他杂军共六个团，现已到皖东某地。其第一八三师之一个旅本向淮北进攻者，现有折向皖东讯。(六) 我在皖东之新四军现已有九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由于该部过去忽视建立根据地任务，以致大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路以东，运河以西我军活动之十余县中，依然是顽固派反共政权及其反共地方武装盘据未去。但近两星期来，即从打退李本一三路进攻之后，我已开始坚决肃清反共派，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缴获许多反共地方武装，以便坚决迎击李品仙之大举进攻。(七) 淮河以北地区，自李品仙派队进攻中间派专员盛天瑾^[1]之后，现又加派桂军一部正开进中。我彭雪枫部已有十四个团，正准备自卫中，该区我已有一部分抗日民主政权，较皖东为巩固。(八) 皖东淮北一带民众抗日反顽固派的情

[1] 盛天瑾，应为盛子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六专署专员兼泗县县长。

绪很高，李品仙之进攻部队不论是桂军及地方武装均不甚巩固，但新四军亦是新创，故须八路加以援助，才能彻底战胜进攻军队，巩固这个极端重要的抗日战略地区。

军 委

二十一日



1940年3月，毛泽东和李富春在延安。



1940年3月，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周恩来、任弼时。



194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延安。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21日)

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要巩固晋西北还是一项大的工作。现在各处磨擦已处在一种新的形势，我们要采用和缓些的政策，军事上实行休战，政治上实行和平攻势。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1]

(1940年3月21日)

迭电均悉。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2]。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940年上半年建立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3月23日)

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的作法较好，我们应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态度。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1]

(1940年3月25日)

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三月二十五日

[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聂荣臻、彭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吕正操、程子华，王震，林枫，程子华、宋任穷，左权、黄克诚，彭雪枫，刘少奇，项英等的电报。

为《边区群众报》题名^[1]

(1940年3月25日)

边区群众报

[1] 《边区群众报》是《陕西日报》的前身，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曾先后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

边区群众报

毛泽东为《边区群众报》题写的刊名。

目前华中的军事策略^[1]

(1940年3月29日)

朱、彭，胡服，项英同志：

(一) 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

(二) 我们完全同意朱彭之决心，将三四四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陈支队^[2]调胶东。三四四旅应速开动，其电台即与胡服联络。

(三) 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

(四) 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军事策略应当如下：

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3]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陈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

[3]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五) 在华中与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受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1]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军委 毛 王
艳

[1] 苏南陈支队，指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江南指挥部指挥。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题词^[1]

(1940年3月)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之胜利品。

[1] 1940年3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业产业展览会上，由于三五九旅的突出表现，毛泽东欣然为他们的产品题词：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之胜利品。

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1]

(1940年3月)

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面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函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乃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时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

[1] 1940年3月，国民党九十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我军得到的情报证明，对方大军压境，不怀好意，形势非常紧张。毛泽东审时度势，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起草的《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阅读斯大林著作。

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 会议上讲话的批语^[1]

(1940年3月)

全部讲话表现三点：（一）军队是暮气沉沉；（二）国民党是靠法令吃饭^[2]；（三）讲的还是抗战。

[1]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在3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讲话的批语。

[2] 蒋介石在1940年3月9日的讲话中指责说，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晋省友军私通敌寇，像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并要叶剑英转告朱、彭：“革命军人一切要照中央法令”。毛泽东对这段话写了“靠法令吃饭”的批语。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1940年4月1日)

朱、彭，杨，刘、邓，徐、朱，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1]：

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

(一) 某方^[2]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

(二) 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2] 指国民党当局。

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三) 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四) 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五) 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

(六) 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七) 具体布置，各地依此总方针计划之。

中央及军委

四月一日

给萧劲光的信

(1940年4月1日)

萧主任：

(一) 此件^[1]即铅印五百份。(二) 印出后，以一份邮寄山西蒲县九十军李军长，以三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九十军六十一师、五十三师、一〇九师师长，以一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五十份寄富县，嘱于^[2]散发于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县商人，以二百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二十份寄秋林王英英^[3]，嘱其散发，以一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区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四月一日

[1] 即《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

[2] 疑为“其”字之误。

[3] 当为王世英。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40年4月1日)

华中国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进攻新四军，形势非常严重。八路军有迅速增援新四军之责任。请朱德、彭德怀考虑由第一一五师在山东地区之部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团立即南下增援；第三四四旅亦应于10日内休整完毕迅速开动。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国民党进攻新四军以及对新四军的增援问题致朱德、彭德怀并告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1]

(1940年4月1日)

确息中央军九十军李文部三个师已集中大宁。估计有该军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王震旅应加强河西岸之阵地，萧劲光负责巩固两延段之河防。有贺、关调集主力部队二至三个团集结于磻口附近待机，一二〇师平汉路东的军队是否需调若干至路西，望速决定电告。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为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致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并转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2日)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蒋九十军的目的在强渡黄河攻取绥德。如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的道路也被隔断。所以，对李文第九十军的行动和李品仙部的进攻，值得严重注意。贺、关须准备以主力对付李文军，同时钳制高双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离两线日军乘虚袭击。现颇感兵力不足，陈士榘支队恐不能东调。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密切注意国民党的行军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1]

(1940年4月3日)

项英同志：

请以你对下列各项的意见电告：（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2]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3]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雄^[4]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泽东

三日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3]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4] 黄绍雄，即黄绍竑，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4月3日)

李文九十军主要阴谋是渡河袭取绥德，威胁延安，切断西北、华北交通。估计该军实行渡河时，高双成可能南下袭击绥德、米脂，日寇亦必乘虚攻击晋西北。因此请考虑：（一）拒李防高抗日三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现有兵力总数是否足够应付严重局面。（三）陈士榘支队如东调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无机动兵力如何解决。（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战指挥统属你们负责。（六）为解决兵力不足是否有从路东调回若干部队之必要。请周详考虑电告。

[1] 这是毛泽东致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4日)

李文第九十军三个师有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召朱周谈判问题以及我军部署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为儿童节题词^[1]

(1940年4月4日)

天天向上。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在儿童节之际为儿童们所写的题词。当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

天天向上
毛泽东

毛泽东为儿童节的题词。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1940年4月5日)

德怀，克诚，陈、罗，雪枫，胡服^[1]：

韩德勤^[2]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3]受我李先念^[4]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克诚，即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由第三四四旅和新一旅等组成）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2] 韩德勤（1891—1988），江苏泗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4]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仙、李宗仁、卫立煌^[1]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2]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3]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驻立煌办事处^[4]，释放张夫人^[5]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6]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三四四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

[1] 李宗仁（1891—1969），广西临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3] 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4] 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5] 张夫人，指张云逸的夫人韩碧。1940年2月，她在携幼子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被李品仙所属国民党军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和一批武器。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于同年9月获释。

[6] 韩、李，指韩德勤和李品仙。

队，罗戴支队^[1]，陈毅之叶飞部^[2]，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毛 王^[3]

微酉

[1] 罗戴支队，指罗炳辉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五支队和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

[2] 陈毅之叶飞部，指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辖的叶飞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3] 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致贺龙等电^[1]

(1940年4月6日)

李文第九十军原定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知我方有准备，故已改变行动。现判断李文部进攻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国民党李文军改变行动问题致贺龙、关向应、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重新题写校名和校训^[1]

(1940年4月10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1] 1940年4月10日，毛泽东题写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新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八字校训。

魯迅藝術文學院

毛泽东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题写的院名。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11日)

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复朱德、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12日)

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自卫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军队进驻这两县应坚决拒绝。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2]。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5月上旬，朱德到洛阳同卫立煌会晤。

致朱德电^[1]

(1940年4月12日)

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离、临屯^[2]、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朱德电的主要内容。

[2] 汾离，指汾阳、离石。临屯，指临汾、屯留。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1940年4月12日)

陈、罗，雪枫，胡服^[1]，并告朱、彭（转左、黄），徐、朱，刘、邓，项英^[2]：

某方^[3]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
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罗附近之
于学忠^[4]，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5]，先念^[6]附近之川军、桂

[1]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指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2]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左，指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指国民党当局。

[4]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5]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孙桐萱（1895—1978），河北交河（今属泊头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

[6]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军、西北军，胡服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1]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四月十二日

[1] 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13日)

时局正在发展，可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变为降日“剿共”的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某方^[2]要降要“剿”都困难，时局便有确定好转希望。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国民党方面。

给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贺电

(1940年4月15日)

迪化盛晋庸先生勋鉴：

齐电诵悉，军民兼领，望实□□□□政之宏模，树百年之大计，下风遯听，祝贺弥深。

毛泽东叩

删

关于对付韩德勤部问题 致刘少奇等电

(1940年4月15日)

刘、项：

为对付韩德勤部，第一一五师彭吴^[1]支队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部。韩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毛 王

四月十五日

[1] 彭吴，即彭明治，当时任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吴法宪，当时任苏鲁豫支队政委。

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延安分会《大众文艺》题名^[1]

(1940年4月15日)

大众文艺

[1]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

致贺龙等电^[1]

(1940年4月16日)

贺、关、王：

彭绍辉旅七一四团从黑峪口渡河后，应位置于葭县沿河一线，切勿开到米脂及义合镇大路，以资隐蔽。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和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项英电^[1]

(1940年4月18日)

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2]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原第六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原第四团。

致刘少奇等电^[1]

(1940年4月21日)

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广泛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并告项英电的主要内容。张云逸、邓子恢，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复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4月21日)

国民党李文之九十军尚在大宁一带未动，该军见我有备，可能停止前进，但尚不能断定。因此你们准备之打击兵力以位置于兴、临、岚三县适当地点，随时准备集结为适宜。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25日)

一、时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险，另一方面仍未丧失克服此种危险的可能性。二、国民党的限共与磨擦政策不会改变，但目前还没有与我党立即分裂的意图。三、李品仙部仍在进攻新四军，请令彭吴支队速向苏北前进，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进。苏北、淮北、皖东是八路、新四两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彼既向我进攻，我自不能坐视。四、蒋邀周去颇迫切。邵力子使苏，似尚有赖苏救急之意。彼方财政经济问题甚严重，军队战斗力大减，人民离心力日增，蒋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将给以团结抗战之助力。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时局等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4月29日)

广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即发展了党；争取了中间势力，主要在军队方面；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成绩。但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